

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 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

王正華**

摘 要

本文以晚明福建地區出版的「日用類書」為中心，藉著其中關於書法與繪畫的章節，自生活與知識角度切入，探究該類書籍與晚明出版文化、藝術相關活動的關係，希望將文本研究與社會文化脈絡相連。

本文將福建版「日用類書」視為晚明新興大眾出版物的一種，也是文化商品。透過與當時書籍市場中他種日用類書的比較，可看出福建版的出版策略與訴求讀者。當其他種類的日用類書多以鄉居仕紳、進學修業為出版目的時，福建版針對當時城市文化瀰漫的效應與新起的功能性識字人口，而出版新形態的書籍，提供新的知識類型與閱讀方式；再因印刷粗劣，售價低廉，稍有餘貲者皆可消費。

就生活而言，福建版「日用類書」所提供的多是當時流行話題，在社交應酬中以供「談話之資」，與今日所謂「食衣住行」的生活分類不同。除此之外，該類書籍與流行文化的關係，尚可在內容編排與版面設計上見出。例如，符合當時重視視覺性的潮流。若自知識層面觀之，福

* 本文為本院主題計畫「明清的社會與生活」子計畫的研究成果，謝謝計畫總主持人及參與學者三年來的砥礪切磋。本文初稿曾在近史所主辦之「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年11月）上發表，謝謝與會學者的寶貴意見，尤其是熊秉真教授。另 Cynthia Brokaw、高彥頤、白謙慎與喬偉諸位教授，以及馬孟晶與陳德馨二位學友，對於本文的完成助益良多，特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03年5月29日，通過刊登日期：2003年8月14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建版「日用類書」的書畫門所提供的藝術知識與繪畫風格，與上層文士的書畫世界，仍有相當大的差距。由此可見，即使在晚明識字人口增加、文化消費盛行的時代，藝術仍是測試社會階層差別的試金石。再者，由於該類書籍中的書畫知識另成一格，也可見日用類書作為閱讀文化的一環，在晚明自有其傳佈的社會空間，有別於長期以來僅以仕紳文人為主的文化消費與知識系統。

關鍵詞：日用類書、生活、知識、印刷文化、文化消費

一、從史料到文化商品：印刷文化的角度

晚明印刷事業與出版文化的蓬勃發展廣為學界所悉，據日本學者大木康的統計，嘉靖中期後的晚明時期，百年間的出版品數量，約為其前（宋代至嘉靖朝前）六百年的二倍。¹在眾多出版品中，有一類書籍，據出版者、刊刻品質、編排方式與內容判斷，可自成一類。這類書籍今存約有三十五種版本，皆為福建建陽地區商業書坊所出。²自外觀視之，此類書籍用紙粗窳，版刻不佳，印刷低劣，品質往往位於他類書籍之下。今存若干版本更因紙質不良，極易碎裂，內文又漶漫不清，刊刻草率之處甚多。³再自內文觀之，此類書籍

¹ 大木康的統計數字來自大陸學者楊繩信所編之《中國版刻綜錄》，該書蒐集中國本地北京圖書館等十七個單位藏書，也採用清末民初葉德輝《書林清話》一書蒐集的版刻材料，雖未必周全，但可見風氣之一斑。見大木康，〈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號 50 (1991)，頁 15-16；楊繩信編，《中國版刻綜錄》（咸陽：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另筆者翻閱《明代版刻綜錄》一書，雖未依據年代統計出版數目，但嘉靖中期後的版刻，確實佔有絕大比例。見杜信孚纂輯，《明代版刻綜錄》（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83）。該書除了彙整大陸重要圖書收藏外，也參考諸家著述，如謝國楨的《明清筆記叢談》，所以數量遠超《中國版刻綜錄》。

² 關於晚明三十多種福建版日用類書的全名、藏地、版本資料與內容目錄，見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寶錄》（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01），頁 641-659。由於該書已有詳細的紀錄，本文不再提供附表。

³ 筆者曾在位於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見到七種原刻本，雖略有高下之別，皆屬粗劣，遠遜於筆者過去在北京及台北所調閱的明代地方志與詩文集。見徐會瀛輯，《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以下簡稱《萬卷星羅》），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1600)序刊本；《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以下簡稱《萬寶全書》），明刊本；《增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明刊本；李光裕輯，《鼎鑄李先生增補四民便用積玉全書》（以下簡稱《積玉全書》），明思宗崇禎年間刊本；博覽子輯，《鼎鑄十二方家參訂萬事不求

在版面安排上，以中線區隔上下二欄，各為其文。各版本之間有高度的一致性，卷帙自天文、地理、風水、醫書、武術，至信函、契約活套、棋譜、笑話等，條目分明，諸項並陳，言其包羅萬象，亦不為過。

此類書籍為日本學者仁井田陞歸類於「日用百科全書」，其後酒井忠夫改稱「日用類書」，並廣為漢學界沿用。據二位學者的說法，「日用類書」起於宋代，盛行於晚明，上述建陽所出，即為其中一類。⁴所謂「類書」者，為適合特定需求而掇取同類知識集結成書，因此多半傳抄他書，再經分類編排而成。類書在中國有長遠的歷史，其淵源與發展頗受書誌學者注意，論著既多，在此不再贅述。惟日本學者新創「日用類書」之名，強調的是宋代後新起一類類書與日常生活的關係。⁵

日本學者對於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發掘與研究具有首創之功，戰前仁井田陞已著手收集，而今存三十多種版本多半藏於日本，近年來並選取品質較佳者，付梓重刊。除了蒐集校閱外，自 1950 年代以來，日本學者運用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中各式記載，已在法制史、教育史、經濟史、醫學史及文學史等領域有所成就。日本學者的成果大致來自於利用該種類書中的新史料，觸及他類史料少及的一般人民生活，尤其在契約的訂定、行商往來路程與庶民教育等方面。換言之，日用類書作為史料，有他書未及之處，可藉以瞭解

人博考全書》（以下簡稱《博考全書》），明神宗萬曆年間刊本；鄧仕明輯，《新鐫兩京官板校正錦堂春曉翰林查對天下萬民便覽》，明書林陳德宗刻本；以上皆為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另見《新刻四民便覽萬書萃錦》，明刊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⁴ 見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2），頁 742-749；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收入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国土社，1958），頁 28-154。

⁵ 關於類書的通論性著作，見戴克瑜、唐建華主編，《類書的沿革》（成都：四川省圖書館學會，1981）；張滌華，《類書流別》（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一般類書論著多未提及宋代後出現的日用類書，關於此類類書與類書源流的關係，見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頁 28-154；坂出祥伸，〈解說——明代日用類書について〉，收入《新鐫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以下簡稱《五車拔錦》），《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 1（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1597)序刊本；東京：汲古書院，1999），頁 8-16；Y. W. Ma, "T'ung-su lei-shu," in William Nienhauser,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841-842。

士大夫階層以外的社經生活。⁶除了將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視為新史料外，日本學者也探討該類出版品作為一類書籍在類書傳統中的位置與特色，如比較宋本日用類書後，認為晚明本更具通俗性。⁷近年來，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研究仍見新意，文學史學者小川陽一將日用類書與戲曲小說並讀，找出二者在描寫酒令與卜算等方面的共通性。⁸醫學與科學史學者坂出祥伸以其中的醫學門為研究對象，討論其知識性質，認為屬於「救急治療」之類，多口訣，俾於實用。⁹

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作為史料的獨特性，也為中文學界共知，尤其是社會經濟史學者，運用於研究商人階層或一般人民的社會習慣。¹⁰由此可見，以該種類書的內容為史料，不探討其文本性質，而企圖對應出晚明庶民日常生活的實況，在學界已行之有年，成果亦顯而易見。此種看法與用法雖非有誤，並且貢獻頗著，然而在經過多年的研究累積下，已難有所突破。更何況，若干研究將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視為「生活實錄」，認定其內容記載為晚明民間生活的全盤映照，他種史料難以匹敵，則值得商榷。這種對於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史料性質與獨特價值的樂觀認定，恐在尚未釐清出版因由與知識性質下，率然接受其內容的透明性與日用性。何況書內個別的記載應有其指涉，或指向晚明社會文化的某一現象，但全本書籍是否皆為如實登錄，又是否涵蓋當時日常生活所有的元素，必須先審閱其內容與編排方式，判斷其成書目的、知識屬性與消費者性質，並非不證自明的事實。

⁶ 見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研究》，頁 742-749；酒井忠夫，〈序言——日用類書と仁井田陞博士〉，《五車拔錦》，頁 1-6；坂出祥伸，〈解說——明代日用類書について〉，頁 7-30；吳蕙芳，〈《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及其史料價值〉，《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30（2000 年 9 月），頁 109-117。

⁷ 見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頁 28-154；坂出祥伸，〈解說——明代日用類書について〉，頁 8-16。

⁸ 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社，1995），頁 97-322。

⁹ 坂出祥伸，〈明代「日用類書」醫學門について〉，收入氏著，《中國思想研究：醫藥養生・科學思想篇》（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1999），頁 283-300。

¹⁰ 例如，陳學文，《明清時代商業書與商人書之研究》（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試舉書中「諸夷門」為例，此門上欄題名「山海異物」，下欄「諸夷雜誌」。¹¹上層包含四域怪物與土產，傳說物種與實存物產前後相連，前有人面人腳的鵝鳥，後有來自三佛齊國的梔子花與沒藥。¹²「諸夷雜誌」亦是真實與想像國度並存，高麗國、日本國與一目國、三首國皆列其中。上下二層皆見出自《山海經》、《事林廣記》與歷朝旅遊紀聞，經過層層傳抄轉釋而古今相雜、真假混揉的異域知識，¹³如果用以說明晚明域外國度的真實狀況，顯然不可行，即使花費心思企圖分辨所記物種、物產與國度的真偽，選取「真實」之面，恐怕也是緣木求魚，遠離成書目的。這些章節條目的正確與否並不重要，值得深思的是如今看來充滿臆測、多元雜質到難以定義為「知識」的內容，如何成為類書中收錄的「知識」，又有何特質與作用。再者，這些關於遠方異域的記載為何收錄於所謂「日用性強」的日用類書中，也不禁令人好奇其與日常生活有何相關。

晚明旅遊風氣旺盛，已為學者指出，¹⁴但「諸夷門」顯然並不適於實際操作，作為旅遊知識的一環。晚明日用類書中的「諸夷門」位於「天文」、「地輿」與「人紀」之後，應來自中國傳統「天地人」知識分類系統。¹⁵在中國本

¹¹ 晚明日用類書多有此門，內容十分相似，其間或有小異，無礙於以下的陳述。例如，《博考全書》不稱「諸夷雜誌」，而名為「各國形象」，但就內容而言，與《五車拔錦》大同小異。

¹² 三佛齊國也見於《明史》與《明史外國傳》，其地以產香料著名。見張廷玉等纂，《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8406-8409；尤侗，《明史外國傳》（台北：學生書局，1977），卷 3，頁 13 下-15 上。另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域外部份與至元庚辰年(1340)版本的《事林廣記》有莫大關聯，「三佛齊國」的條目也出現在該書的「方國雜誌」中。見陳元靚，《事林廣記》（至元庚辰鄭氏積誠堂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251-254。關於《事林廣記》與晚明日用類書的關係，詳見下文。

¹³ 關於中國自《山海經》以來長期累積下來的異域知識與晚明《三才圖會》等書相關內容的關係，見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利瑪竇來華前後中國人關於異域的知識資源及其變化〉，發表於「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國際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 10 月 22-24 日。

¹⁴ 關於晚明旅遊文化，見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發表於「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年 11 月 21-23 日。

¹⁵ 關於「天地人」的知識分類與晚明視覺文化中的「天地人」，見 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7-101.

土的「人紀」類知識後，置入當時可蒐集到的域外知識，即使新舊雜陳、來源不同也無所謂。傳統知識分類或許可以解釋「諸夷門」出現在以知識採集、分類與編排為主的類書中，但是仍必須回答為何該類書籍一再重複刊印「諸夷門」。傳統知識分類的繼承雖為其因，但當時社會文化的脈絡也不可忽視。

晚明文化中有「好奇」的一面，域外異境提供一種想像的空間與憑依，奇人奇事奇物皆可由此源源湧出。除了福建出版的日用類書外，《三才圖會》與《山海經圖》等書也提供類似的記載與圖繪。¹⁶因此，若將「諸夷門」視為晚明社會好奇風潮的體現，日用類書在編纂時擷取如《山海經》等書的奇異光景，歸為一門，或許較接近編書原委。再者，「諸夷門」的龐蕪冗雜、割裂瑣碎，如何成為知識，也與晚明對於知識的看法有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於類書所收蕪雜無序、剽竊淺陋的批評，雖未指出為晚明福建商業書坊所出之日用類書，但推想該類書籍正是四庫編者所謂之「稗販之學」，輕蔑貶抑的意味甚為明顯。¹⁷在四庫編者的眼中，日用類書並不成為「書籍」或「學識」。然而，在明季一代，此種書籍或其所代表的知識系統的出現，指向晚明社會文化的重要特色。據商偉(Shang Wei)等學者的研究，或因陽明學派重視日用經驗勝於抽象學說，晚明文化以生活為重，「日常生活」成為被認可的知識內容，甚且是知識系統的核心。以「日常生活」為知識內涵，有別於傳統學術，此種知識的結構一如日常生活，較為錯散無序，且以平行並列為主，異於儒家位階性及秩序感強的知識結構。¹⁸如此看來，生活與知識合

¹⁶ 見王圻、王思義編集，《三才圖會》，冊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人物卷 12、13、14，頁 816-872；胡文煥編，《山海經圖》，《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1-284。關於晚明版畫中奇人奇物的研究，見馬孟晶，〈意在圖畫——蕭雲從《天問》插圖的風格與意旨〉，《故宮學術季刊》，卷 18 期 4（2001），頁 120-138。另明清插圖本《山海經》的介紹及其圖像來源，見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頁 1-16。

¹⁷ 見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頁 29-38。

¹⁸ 見 Sakai Tadao, "Confucianism and Popular Educational Works," in William de 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38-341; Shang Wei, "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Cihua* and the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發表於「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

一，「諸夷門」所包含的內容或可說是生活中常見的流行常識。

由上例可知，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並非只是忠實地反映真實，也不一定可實際操作如手冊般，與日常生活究竟如何相關，必須再作思考。更何況「日常生活」詞性模糊，用在學術研究上也非早有定論的概念範疇，與其先驗地將該種類書視為日常生活的整體反映，或許更應將「日常生活」視為一可討論的範疇，有其歷史性。元代的日用類書《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未見關於域外的章節，可見「日常生活」並非一歷時皆然的常態。再如今日提及「日常生活」時，不免以「食衣住行育樂」為分類與思考架構，但晚明是否也是如此？若以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編排與內容為研究對象，見出其日常生活的性質，並藉以觀察晚明社會文化的特色，或許可有收穫。也就是說，「諸夷門」如何是「知識」，如何進入所謂「日用生活」中，為一值得討論的現象，尤其是該門類與晚明社會文化的交涉，以及此種交涉所描繪出晚明重點知識的性質與「日常生活」的圖像。

再者，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內容除了消極地複製真實外，其積極建構面也應考慮。如果將書籍視為積極形塑社會文化的力量，不禁令人好奇晚明日用書籍如何傳播知識，建構何種日常生活，又如何特定的社會場域中發揮影響力。「諸夷門」中高麗國與日本國的對比，即是有趣的例子。在內文的描寫中，「高麗國」最受稱讚，因其漢化最深，為一禮教國度。圖繪中的高麗人身穿廣袖長袍，手執摺扇，以正面穩定之姿示人，十足君子樣貌。¹⁹與之相對，日本國則成為「倭寇」，人物赤身赤足，僅以些許布縷包裹臀部，手拿長刀，睥睨之姿，令人害怕，真是盜賊之像（圖一、二）。此一對比一

備處，1999年7月16-17日。此文後有修訂本，為喬教授計畫出版之新書中的一章，承蒙惠予贈送，有幸拜讀在先，謹致謝忱。

¹⁹ 據《三才圖會》、《萬曆野獲編》等書記載，摺扇於明初自日本、高麗等國輸入中國，首見流行於皇宮內苑，此後流風所染，晚明時期，不僅士人階層，甚至連青樓妓女與閨閣婦女都人手一扇。摺扇至此，成為某種風雅與流行的標記。見王圻、王思義編集，《三才圖會》，冊中，器用卷12，頁1344；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收入《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26，頁663-664。既然日本與高麗都以摺扇聞名，晚明日用類書選擇高麗而非日本手持摺扇，更可顯示此為經過選擇的形象建構。

則顯現晚明社會對於高麗與日本的刻板印象，好惡差別極大，再因其在福建版日用類書中屢屢傳抄翻刻，此種印象更深入人心，自此建構出晚明讀者心中二國極端相對的形象。²⁰

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所牽連的複雜面向顯然不只侷限於史料的性質，上引小川陽一及坂出祥伸的研究可為範例，見出新的研究方向。前者在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通俗小說間所發現的共通描述，到了商偉的研究中，有更精彩的發揮。商偉透過對於《金瓶梅詞話》與日用類書之間複雜而豐富的文本互讀性(intertextuality)，討論晚明日常生活論述的建構與普及。在其二稿中，更加强探討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知識性質與其所縮結的文化脈絡，以日用類書中「侑觴」、「蹴鞠」與「笑謔」等門相應於《金瓶梅詞話》中的「子弟文化」，點出日用類書與城市文化的關係。商偉指出福建版日用類書知識的城市性與越軌性，如「商旅門」教導的嫖妓之道，彷彿在儒家家庭與社會生活穩固不變的結構中，提供逸脫之法。此種理解與坂出祥伸對於書中醫學知識乃救急性質的判斷不同，但同樣注意到知識與生活的密合度。²¹

除了商偉直接相關的研究外，英日文學界對於晚明各式新型出版品的關注，值得參考。此類出版品包括女性詩詞、戲曲小說與善書，皆是晚明印刷文化蓬勃氣象中崛起的新興要角。高彥頤(Dorothy Ko)的研究以十七世紀女性為主體，因論及女性受教育而識字，甚且成為讀者及作者的歷史新頁，遂觸及晚明商業印刷的發達與閱讀大眾(reading public)的出現，其中也提到日用類書。²²何谷理(Robert E. Hegel)關於晚明繪圖本章回小說的研究，綜合前人研究成果，分析該種書籍出現的各種社會經濟層面與閱讀文化(reading culture)

²⁰ 見《五車拔錦》，頁188-190；《新刻艾先生天祿閣彙編採精便覽萬寶全書》（明思宗崇禎年間刊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紙燒本，原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卷7，頁1下-2下；《新鐫翰苑士林廣記四民便用學海群玉》（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1607)序刊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紙燒本，原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卷10，頁1下-2上、4上。

²¹ 參見註18。

²² 見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9-68.

的關係，包括出版業的發展、生產技術的改變、插圖與文本的關係，以及小說閱讀的方式與群眾等。²³另外，酒井忠夫對於晚明中國通俗教育的興趣，也及於善書的研究。除了思想層面的討論外，善書的製作與流通也是他的關心點。²⁴

福建版日用類書的成類出現也是晚明出版文化中深具啓發性的一頁，就刊刻數量來說，雖與六百多種的戲曲、一百種繪圖本章回小說相去甚遠，²⁵但因此類書籍保存價值較低，且用紙粗糙，又易損壞，今存三十五種版本可能遠低於實際的刊刻數目。再者，此類書籍出版地集中，編排與內容雷同性高，作為一整體的研究對象，視為晚明印刷文化中新興的一類出版品，在消費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也是一類「文化商品」，正可見出其集體意義。在此之前的相關研究，或由於重視書中內容的史料性質，或僅指出某門知識的性質，而觸及印刷文化角度者，又因非以日用類書為重點，討論不夠深入。

近年來關於晚明書籍的研究，已非書誌學者的專門，尤其是印刷文化的研究角度，橫跨歷史、文學與藝術史，成為一新興領域，而明清出版品與其所帶來的巨大變動，也漸為學界矚目。²⁶此一研究取向在西方也屬新創，成形

²³ Robert E. Hegel,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何谷理另有二篇相關論文可供參考，“Distinguishing Levels of Audiences for Ming-Ch'ing Vernacular Literature,”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112-142；〈章回小說發展中涉及到的經濟技術因素〉，《漢學研究》，卷6期1（1988年6月），頁191-197。前者以李密故事的各種版本為中心，探討通俗小說的讀者群。

²⁴ 見酒井忠夫，《增補中国善書の研究》（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99）。

²⁵ 見林鶴宜，〈晚明戲曲刊行概況〉，《漢學研究》，卷9期1（1991年6月），頁305-323；Robert Hegel,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140-141.

²⁶ 例如，歷史學的研究見 Harriet Zurndorfer, “Women in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Chinese Encyclopedi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from Some Sung, Ming and Ch'ing Works,” in Zurndorfer, ed., *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1999), pp. 354-396;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2002). 文學學者的研究除了何谷理外，見 Ellen Widmer, “The Huangduzhai of Hangzhou and Suzhou: A Study in Seventeenth-Century Publishing,”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 1 (June 1996), pp. 77-122. 藝術史的研究見 Li-chiang Lin, “The Proliferation of Images: The Ink-Stick Designs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Fang-shih mo-p'u* and the *Ch'eng-shih mo-yuan*,” (Ph. D.

不過十數年。書籍的歷史牽連甚廣，舉凡知識的認定與傳播、不同階層與群體的溝通、出版技術與科技、經濟狀況、識字率與閱讀文化，以及文化商品的消費等議題皆在其中。²⁷在中國印刷文化的研究中，對於類書的關注並不少，除了書誌學者以傳統圖書分類觀點討論類書作為一類書籍的源流與演變外，宋史學者運用南宋類書討論士人學習之道與智識文化(intellectual culture)，質疑傳統思想史以大思想家為研究對象，並企圖修正或補充南宋道學獨大且成為唯一學術取徑的說法。由於關心的是士人學文或舉業所用類書，宋史學者仍在認知與學習的範疇內探討類書的知識構成與內容。²⁸另婦女史學者也以類書的分類與內容，討論作者或編者對於女性的態度與女人在中國知識系統中的位置。²⁹

上述研究所用的類書多為菁英之作，有編者的意志與知識背景貫穿其中，或可類比法國狄德羅(Diderot)編著之《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其中言及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分類與系統，不免思及傅科(Michel Foucault)的論說。傅科的討論涉及認識論與意識形態的關係，百科全書於此成為現存知識系統的全覽，透過書中的分類，可察知一個社會如何認識世界，如何將特殊的認知視為常識。因此人類社會皆有的分類與認知行為，成為分析知識與權力交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8)；馬孟晶，〈文人雅趣與商業書坊——十竹齋書畫譜和箋譜的刊印與胡正言的出版事業〉，《新史學》，卷10期3（1999年9月），頁1-52。另有二本關於明清印刷文化的新書即將出版，見 Kai-wing Chow, *Print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Cyn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hcoming).

²⁷ 關於印刷文化與書籍史的研究簡介，見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in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90), pp. 107-135.

²⁸ Peter K. Bol,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Wuzhou ca. 1200: Finding a Place for Pan Zimu and the *Complete Source for Composition*," 收入《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1996), 頁1-50; Hilde de Weerd, "Aspects of Song Intellectual Life: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Some Southern Song Encyclopedias," in *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 vol. 3 (spring 1994), pp. 1-27.

²⁹ Harriet Zurndorfer, "Women in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Chinese Encyclopedi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from Some Sung, Ming and Ch'ing Works," pp. 354-396.

織糾結現象的絕佳典範；也就是說，提出知識分類與認知的文化建構性，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而普遍接受的分類原則，事實上為權力操作的結果。³⁰

這些研究範例並不適用於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研究，因為性質迥異。福建版日用類書的編者菁英性少，少數有名之士恐為偽託。列名編者中最有名的是艾南英、陳繼儒及張溥，三人皆在《明史》有傳，名聲顯赫，名號甚且列於日用類書的書名標題中，藉以吸引買者。³¹艾南英確與出版事業有關，以編纂八股選文等制舉用書聞名。其時，在野文士透過編選科考用書，甚至能影響天下文風，進而結黨成派，左右朝政。艾南英雖比不上其中的佼佼者湯賓尹，其影響力也不可小覷。³²陳繼儒早棄諸生，以其文藝長才，編書著述，在晚明出版事業中名利雙收。³³二位人物聲聞天下之勢，福建地區出版的劣質書籍能否延攬，令人質疑。無怪乎書誌學者認為陳氏之名，多屬冒用，不能當真。³⁴更何況張溥身為復社領袖，天下文士翕然景從，如何為建陽商業書坊編纂日用型類書？³⁵

其餘列名編者，多為無名之人，史冊無傳。³⁶例外之人有徐筆洞與余象斗，

³⁰ Robert Darnton, "Philosophers Trim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the *Encyclopédie*," in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p. 191-209.

³¹ 見張廷玉等纂，《明史》，頁 7402-7403、7404-7405、7631-7632。例如，《新刻艾先生天祿閣彙編採精便覽萬寶全書》等，見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頁 653-657。

³² 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19-121；金文京，〈湯賓尹與晚明商業出版〉，收入胡曉真主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80-100。

³³ 王鴻泰在其博士論文中對於晚明「名士」的出現與社會身分的經營有精闢的見解，陳繼儒即是以出版業博取社會名聲與實利的標誌人物。見〈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11月），頁 230-232。關於陳繼儒的出版活動，見大木康，〈山人陳繼儒とその出版活動〉，收入《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冊下（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 1233-1252。

³⁴ 見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頁 467-468。

³⁵ 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頁 121-140。

³⁶ 李光裕與周文煒雖於史冊有傳，但見其內容，二人皆因殉明而留名，且前者為武將，恐與日用類書的編者同名而已。例如，舒赫德奉撰，《欽定聖朝殉節諸臣傳》（台北：商務印書館，1976），卷 5，頁 43 上-43 下，卷 9，頁 34 下。

徐爲江西人，布衣終生，曾受湯顯祖、湯賓尹等文士賞識，似以編書著述維生。³⁷余象斗身兼福建版日用類書《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台萬用正宗》（以下簡稱《三台萬用正宗》）的編者與出版者，爲當時建陽商業書坊中的代表人物，出書多種。余氏本以功名爲志，鄉試失敗後，轉而經營家傳書坊，非僅爲謀生餬口，更企圖在功名之外，以出版著述求取留名之道。此一用心在《三台萬用正宗》一書的編纂也可見出，除了版刻最佳外，與他版日用類書不同的是，該書前有「琴棋書畫」版畫，畫出土大夫群聚參與藝文活動，明顯用來提升該版日用類書的地位（圖三）。書前尙有余象斗留影一幅，圖中余氏身著文士服飾，處於富貴庭園，妻妾奴僕環繞，屋旁對聯更表明像主志在萬里青雲間，絕非區區小輩（圖四）。書坊主人在出版物中留影出名，並刻意經營自我形象的做法，余氏雖非首例，但余氏共留有三種畫像，《三台萬用正宗》前之留影尙見於他種出版品，顯見其企圖心，以上層文士身分自居，意圖取得社會名聲。³⁸

由余象斗之例看來，書商透過發行書籍，不僅獲利，也可名揚天下，並進而取得文化資本。³⁹然而，就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出版看來，余氏應爲孤例，其餘版本的日用類書與文化資本的累積顯然無關，純爲商業書坊射利之作。若干版本甚至因貪圖快速出版，重複使用各家版刻拼湊而成，因而前後書名與出版者不一。⁴⁰再者，余象斗一如徐筆洞，屬底層士人，雖曾進學，並

³⁷ 見金文京，〈湯賓尹與晚明商業出版〉，頁 91-92。

³⁸ 關於余象斗其人與其出版事業，見蕭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中）〉，《文獻》，期 22（1984），頁 214-216；蕭東發，〈明代小說家、刻書家余象斗〉，收入《明清小說論叢》，輯 4（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頁 195-211；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pp. 41-48；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 241-249；金文京，〈湯賓尹與晚明商業出版〉，頁 82-85。關於余象斗之書前畫像，見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pp. 217-220, 381, note 17。

³⁹ 徽籍而寓居南京之胡正言、汪廷訥，同爲具有文人氣息之書商，也企圖以出版事業建立社會聲名。見馬孟晶，〈文人雅趣與商業書坊——十竹齋書畫譜和箋譜的刊印與胡正言的出版事業〉，頁 1-52；林麗江，〈徽州版畫《環翠堂園景圖》之研究〉，收入《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頁 299-328。

⁴⁰ 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382-384；蕭東發，〈建

無任何功名，而其餘史傳無名之編者，恐也屬於同一社會階層。這些編者的編書動機與學術的倡導無關，更不涉及學術與權力的關係。晚明日用類書雖傳播知識，卻不是某一菁英士人的選擇，與其視之為菁英文本，以作者、編者立場細究其意圖與知識建構，毋寧視之為一類不求品質、以量取勝的商品，內容互相傳抄轉印，在晚明蓬勃的出版市場中，以其特質在書市大餅中分得利益。

福建版日用類書的特質，除了顯示在定價範圍與刊刻技術外，最重要的應是卷帙內容與編排形式。唯有透過對於書籍細部內容與形式的了解，再經由與他種日用類書的比較，方能見出福建地區日用類書的市場區隔與預設讀者。再者，也唯有透過特定內容的解析，如書畫相關門類，方能釐清該類書籍到底滿足了讀者何種需求，提供了何種知識，又如何與晚明的生活連結。如果書籍的出版與流通必然導向讀者與閱讀層面，以印刷文化研究中的「閱讀文化」觀之，文本經由閱讀行為而產生行動，發生效用，也就是說，所有的閱讀行為皆是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的一種，也統有社會空間(social space)。⁴¹如此一來，福建版日用類書與他種日用類書在內容形式與市場銷售上的區隔代表著讀者群的不同與社會空間的分化。

本文選擇以書畫門來探討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中的生活與知識，主因在於藝術本屬上層階層之事，包括藝術品的取得與美學知識的內化皆非有錢即可，尚且涉及家庭背景與教育水準等文化資本的養成。即使在今日所謂「大眾社會」與「國民教育」普遍的時代，社會階層的區分仍歷歷清晰，而藝術仍為最好的測量尺度。⁴²在學界普遍將日用類書認定為「通俗文化」(popular

陽余氏刻書考略(下)》，《文獻》，期 23 (1985)，頁 242；坂出祥伸，〈解說——明代日用類書について〉，頁 7。

⁴¹ 見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 Lydia G. Cochra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6; 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trans. Lydia G. Cochra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4.

⁴² 即使在 1960、70 年代的法國，亦復如此。見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9-96.

culture)之一環，與「菁英文化」相對時，其內容中的藝術知識，或許正是探究二者交錯、對應或隔絕的最佳試驗。更經由此一切入點，對原先通俗、菁英文化之範疇與社會空間有更細緻的理解，不再粗略地區隔二分，甚而檢討此種區分在研究上的有效性與思索突破之道。

二、晚明書市中的「日用類書」：編輯策略與可能讀者

晚明繽紛的書籍市場中，可稱之為「日用類書」者，除了福建商業書坊的出版外，尚有多種。討論福建版日用類書的可能讀者，不得不對市場的區隔有所理解，而此種區隔最明顯地表現在不同地區不同版本的編輯策略與內容選取上，唯有比較，方能見出如《三台萬用正宗》、《五車拔錦》或《萬寶全書》等福建版日用類書的特色。

最早的「日用類書」為南宋後期陳元靚的《事林廣記》，原版今已不存，但此書在元、明二代迭見刊刻，有其流通性。元代今存二種版本，分別為至順(1330-1333)與至元庚辰(1340)刊本；明代至少有八種版本存世，除了坊刻外，官府也曾刊刻流佈。陳元靚並非名士，據學者考察，乃福建崇安人士，地近建陽，科場失意後，可能棄絕仕途，受雇於書坊，轉以編寫維生。⁴³今存元明坊刻本之《事林廣記》皆為福建所出，可見該書的地緣關係。⁴⁴眾多版本雖有所增減，在內容上差異不大，惟編排有所不同；明版基本上接續元代，遂分至順與至元二種。⁴⁵今存明代版本除了未表明刊刻時間與出版者的「明刊

⁴³ 關於《事林廣記》的版本及內容比較，見胡道靜，〈1963年中華書局影印本前言〉，《事林廣記》，頁559-565；森田憲司，〈關於在日本的《事林廣記》諸本〉，收入同書，頁566-572。森田之說另見〈『事林廣記』の諸版本について——國內所藏の諸本を中心に〉，收入《宋代の知識人——思想・制度・地域社会》（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287-317；吳蕙芳，〈民間日用類書的淵源與發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18（2001），頁7-10。

⁴⁴ 除了上註所引胡道靜與森田憲司的研究外，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詹氏進德精舍與西園精舍刊本，也是福建建陽地區商業書坊所出。關於進德精舍，見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頁317。西園精舍可能為建陽出版大姓余氏所有，見杜信孚纂輯，《明代版刻綜錄》，冊2，頁8上；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p. 231。二書坊皆活躍於明代初中期。

⁴⁵ 見上註胡道靜與森田憲司之文，另見Lucille Chia, *ibid.*, p. 360, note 110.

本」外，皆為明代初中期所刊，其中以嘉靖二十年(1541)余氏敬賢堂本最晚。⁴⁶由此可見，《事林廣記》即使在晚明翻刻，流傳顯然有限，恐為同是福建商業書坊所出之三十多種新型日用類書取而代之，後起之秀既擷其所長，又因時而變，滿足書市的需求。

細觀之，《事林廣記》與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大有關聯，其一在於圖版的重視，其二則在細部內容上見得傳承轉錄。《事林廣記》為現存早期書籍中收有大量圖示、圖表、插圖的代表，其前雖有唐仲友的《帝王經世圖譜》，但數量較少，且為地圖、圖表等不具形象的設計；《事林廣記》則二者皆有，具象插圖如《夫子杏壇之圖》，繪孔子坐於樹下，手撥琴弦，旁繞十位弟子（圖五）。⁴⁷福建坊刻自宋代以來，即注重圖示與插圖，《事林廣記》與晚明日用類書皆有此特色。⁴⁸再由《事林廣記》所收知識條目觀之，〈輿地紀原〉、〈歷代國都〉、〈方國雜誌〉、〈識畫訣〉、〈畫分數科〉、〈符喜（熹）應評畫〉等常見於晚明日用類書，內容也相似，似乎有地緣傳統因素。⁴⁹

⁴⁶ 見森田憲司，〈關於在日本的《事林廣記》諸本〉，頁 571。關於余氏敬賢堂所刊書物，見杜信孚纂輯，《明代版刻綜錄》，冊 6，頁 38 下。余氏自宋至明皆為福建地區商業書坊重要家族，雖未見敬賢堂之資料，應屬該家族所有。另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二本西園精舍刊本，其實為同一本之複製，可是據該館紀錄，一定為弘治年間(1488-1505)，一是萬曆(1573-1619)，不知根據為何。查版刻類參考書，西園精舍出書的紀錄最遲至正統年間(1436-1449)，其後再無，而森田憲司以內容判斷西園精舍刊本為元代至順年間所刊，應為錯誤。經比對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至順年間《事林廣記》善本，可見史語所之西園精舍刊本以至順刊本為本，略有增減，版刻年代仍應為明代。

⁴⁷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76（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頁 1-111。據聞該書有嘉泰元年(1201)周必大之序，關於唐仲友，以及《帝王經世圖譜》與《事林廣記》在圖示上的比較，見胡道靜，〈1963 年中華書局影印本前言〉，頁 561。

⁴⁸ 見蘆田孝昭，〈明刊本における閩本の位置〉，《天理圖書館報 Biblia》，期 95（1990 年 11 月），頁 91-93；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pp. 39-42, 52-62.

⁴⁹ 此處及以下之討論所用《事林廣記》版本為中研院史語所藏西園精舍刊本，如上所述，西園精舍刊本與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元代至順刊本關係密切。另 Lucille Chia 見解亦同，見 *ibid.*, p. 360, note 110。《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西園精舍刊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紙燒本，原藏日本內閣文庫）。此刊本續集卷 5 至卷 9，僅存條目，內文不見，包括「文藝類」書畫、遊戲等部份，所缺可以至元庚辰鄭氏積誠堂刊本補之，即北京中華書局 1999 年所出《事林廣記》。就「文藝類」而言，故宮至順刊本與至元刊本雖有編排次序等差異，但內容一致性甚高。

然而，縱然有種種傳承，晚明日用類書與《事林廣記》仍有顯著差異。晚明版本使用圖示與插圖的程度，已達圖文並茂，幾乎各卷皆有，遠非《事林廣記》能比。例如，《事林廣記》的圖畫部份僅有文字，晚明日用類書加上許多插圖，形成一頁中上文下圖的形式；〈農桑門〉亦是，《事林廣記》於起始處三圖並列，而晚明版本則頁頁有圖，上文下圖，編排清晰。唐代已有版面上下分隔、圖文並存的形式。自宋代後，福建出版的書籍於此頗有發揮，尤其在繪圖本平話上，晚明時期福建坊刻將其普遍用在日用類書等書籍的版式上，形成一大特色。⁵⁰更重要的不只是圖像增多，且益趨複雜，而是編排方式的不同。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編排倚重視覺性，許多條目皆設計出特別的版式，便於觀看與翻查。試舉「文翰」與「啓劄」二門為例，稱呼及書帖等範例毋需圖示與插圖，但晚明日用類書在編排上仍以統一格式整合相似用法，不同用法又在視覺上各自區分，讓人一目瞭然（圖六、七）。⁵¹

上述各種版式設計的優點，一則在於可填入較多內容，減少版面，節省成本；然而，如果僅以成本為考量，斷無增加圖示的道理，因為這些視覺性強的設計，雖然版刻粗糙，仍費時費工，以量多價廉取勝的日用類書，何須如此？上文下圖的版面設計，除了增加文字負載量外，或也因為易於將各條目分類置放，在視覺上看起來統合分明而受到青睞。圖示、格式或插圖等視覺性的設計也有此優點，有助於使用者檢索翻閱，找到需要參考的項目。更何況晚明視覺性思考發達，如此的編排正適合當時潮流，在繪圖本章回小說興盛的時代，在圖像跨越媒介廣為流通的時代，不以圖像取勝，不求版式引人，在市場上可能難以生存。⁵²

⁵⁰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pp. 40-42, 193-220.

⁵¹ 此處及以下所言之晚明日用類書，除了前述已引用之版本外，尚可見徐會瀛輯，《萬卷星羅》，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76，頁 113-405，即為前引之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以下簡稱《萬書淵海》），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1610)刊本；《新刻搜羅五車合併萬寶全書》（以下簡稱《五車萬寶全書》），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1614)序刊本，後二者皆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各版本的內容雖有參差，但雷同性仍強。

⁵² 關於晚明文化中圖像的流通與視覺呈現的重要性，見 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再者，晚明日用類書在「正統知識」上頗見削減，尤其是與儒教、幼蒙或農業有關的部份。⁵³如《事林廣記》有聖賢、先賢部門，列出孔子七十二弟子等上百名歷史上有名人物，再有儒教部份，教導禮樂射御書數、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儒家進學德目，而這些在晚明日用類書中一應闕如。傳統的農業知識只剩農桑部份，刪去花果、竹木、獸畜等，可見《事林廣記》關照的是農業生活的整體，而晚明日用類書僅取基本，在所包括的知識範圍中存其一格。

晚明日用類書增加的部份，顯而易見落在人際交往上，與往來應酬息息相關。這些部門包括稱呼方式、書簡格式等人際往來的應對禮節，更涵蓋各式娛樂酬酢。《事林廣記》已有琴棋書畫、投壺雙陸等項目，置於「文藝類」。晚明日用類書除此之外，再加上「侑觴」、「笑談」等眾人群聚取樂之助，文藝氣息少，娛樂意味多，可以想見在觥籌交錯的場合中，既可用「侑觴門」行酒作樂，又有「笑談門」之新聞與笑話營造歡愉的氣氛。在「助談之資」一事上，晚明日用類書就以數卷涵蓋之，除了「笑談門」外，還提供歷朝故事、公案情節或勸世良言等以佐談興。其餘如燈謎、詩對與風月等部份，又何嘗不與特殊節慶或場合的社交生活相關。「詩對門」包含四、五、七言詩與對聯的範本，吟詩作對除了提供社交場合人際互動之憑藉外，也是喜慶壽誕等特殊時日中人情互惠的重要方式之一。《事林廣記》的「風月綺談」提供情色故事，而晚明日用類書的「青樓規範」則直接教導嫖妓調情之道。在青樓已成晚明城市重要社交地點，而青樓文化已成晚明城市文化重要一環時，具備與妓女交往的技巧，顯然才是「見過世面」的城市人。⁵⁴

Early Modern China, pp. 25-76；馬孟晶，〈耳目之玩：從《西廂記》版畫插圖論晚明出版文化對視覺性的關注〉，《美術史研究集刊》，期 13 (2002)，頁 202-276。

⁵³ 關於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事林廣記》內容大綱的比較，見吳蕙芳，〈民間日用類書的淵源與發展〉，頁 13-14。

⁵⁴ 關於晚明青樓文化，見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展開〉，頁 246-291；王鴻泰，〈青樓——中國文化的後花園〉，《當代》，期 137 (1999 年 1 月)，頁 16-29。

由此看來，《事林廣記》中的知識與生活，在晚明時有重大轉變。傳統的知識以個人修養為目的，偏重於問學進修，講求全貌與進學階段，而承載此種求知形態的生活方式顯然趨向農業與鄉村。晚明日用類書在選取上，擷取《事林廣記》中可用之分類與內容，但也大幅度改變，適合當時社會風氣，尤其傾向於社交應酬方面，也深具城市文化色彩。

流通於晚明的日用類書，除了《事林廣記》外，尚有他種。元代出版的《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在明代也幾經翻刻，官府與民間俱有。⁵⁵今見明代版本之一，前有嘉靖三十九年(1560)田汝成之序，田氏列名《明史·文苑》，著作等身，有名於世。⁵⁶其序文既考證該書來歷，又指明出書因由，想非偽造。田汝成認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載有幼蒙、孝親、禮儀、官箴與攝生等內居，居家居官皆宜參考，有助於修身、齊家、治國。⁵⁷綜觀該書內容確實如此，在儒家禮教的框架下，提供縉紳家族治家及為宦之道，訴求的讀者應是身為士人的戶長。該書起首章節標名「為學」，講述家族子弟成學進階之法，自行為舉止至讀書作文皆在內，對象顯然並非子弟本身，而是擔當教育重責的家長。「家法」一章則包含婚冠喪葬禮儀，引用司馬光之「居家雜儀」。

「為學」及「家法」二章說明《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適用於仕紳家族，書中關於官箴吏學的部份也可看出偏向士人階層的編選原則。然而，書內包含多種非常實際且具有指導性質的條目，如家禽家畜的牧養、蔬果藥材的種植，再如作醬醃菜的方法與衛生養身的祕訣，看來皆與成學無關，也不是儒教的治家規範，作何解釋？細觀此部份內容，反映出家業管理的實際需求，也就是男性家長如何經營一個以農牧營生的家族生活，讀者並非實際操作者，而是管理者。如此看來，這些實際生活的指導內容，指向一個非商業非

⁵⁵ 見〈出版說明〉，《居家必用事類》（嘉靖三十九年(1560)田汝成序刊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未標頁碼；吳蕙芳，〈民間日用類書的淵源與發展〉，頁9-10。

⁵⁶ 見張廷玉等纂，《明史》，冊24，頁7372。據田汝成之說，該版本為洪子美所刊。洪氏名樞，錢塘人，家富藏書，喜刻書，以「清平山堂」為名。見杜信孚纂輯，《明代版刻綜錄》，冊3，頁23上-23下。

⁵⁷ 見田汝成，〈居家必用事類敘〉，《居家必用事類》，頁1-2。

城市的鄉紳生活，擁有土地與家業，家中族長或子弟進學問舉，並可能任官為吏。⁵⁸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在明代（包括晚明）的一再翻刻，可見有其市場，此類引用儒家「修齊治平」之道為編書說詞的日用類書，除了《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外，在明代中後期亦見他種。弘治十七年(1504)宋詡所編的《宋氏家要部·家儀部·家規部·燕閒部》即是其一，宋詡之序明白點出儒家進學之理，並期望所編之書有助於齊家環節。觀其內容，在端正家風與講定禮儀外，也不乏士人理家所必須知道的諸種實際知識，如農桑事宜或衛生祕方，再由田產、珠寶、牲畜等各式帳簿看來，訴諸的讀者仍為有家有業的鄉紳階級。⁵⁹

明末讀書坊所刻之《居家必備》，前有明初著名文人瞿祐的序言。瞿祐，字宗吉，錢塘人，詩詞有名於當世，在明代文學選集中，不乏其傳記。⁶⁰在瞿祐的序言中，倡言教導子弟、治生齊家為居家之要，描畫出儒家傳統下耕讀之家的景象，一如宋詡與田汝成。瞿祐之序並未指明為《居家必備》一書所寫，然該序置於書前，仍顯示出版者認可其言。書中錄有多種晚明著作，如沈顯的《畫塵》與高濂的《遵生八箋》，成書年代應在明末。《居家必備》

⁵⁸ 據吳蕙芳，〈民間日用類書的淵源與發展〉一文，《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有萬曆七年(1579)序刊本，惟台灣未見，只能略而不談。比對可見的四種版本，內容一致。見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61（明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頁 1-422；《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 117（明刻本；台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頁 28-444；《居家必用事類》，嘉靖三十九年(1560)田汝成序刊本；《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184（隆慶二年(1568)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309-728。江蘇太倉南轉村施貞石夫婦合葬墓出土一本《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前有田汝成序言。施氏崇禎四年(1631)去世，處士終身，未曾出仕。墓中另出土字書、《古今考》與《戰國策索隱》等書，可見一介鄉紳的藏書。由此可知田氏序刊本《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流通，也顯示該書讀者的屬性。吳聿明，〈太倉南轉村明墓及出土古籍〉，《文物》，期 3（1987），頁 19-22。

⁵⁹ 見宋詡，《宋氏家要部·家儀部·家規部·燕閒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61，頁 3-69。

⁶⁰ 例如，陳田，《明詩紀事》（台北：中華書局，1971），乙籤，卷 13，頁 1 上-1 下；朱彝尊，《明詩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 22，頁 1 上-1 下；朱彝尊，《明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頁 11 上-11 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乙集，頁 189-190。

在晚明至少刊行二次，有其流傳；其中讀書坊屬杭州書林，主人段景亭，該書坊活躍於天啓年間(1621-1627)，出書多種；另一出版者心遠堂，今存書目除《居家必備》外，僅見崇禎年間(1628-1644)刊本一種，為明初歙縣文人唐文鳳的文集，心遠堂歸屬不詳，應也位於江南地區。⁶¹由書坊所在地看來，《居家必備》的江南與福建有地區差異，雖不在出書的種類及行銷的區域上有所區別，然晚明福建的出版形態純為市場走向，不講品質，不求進步，反以快速價廉、趨向大眾而欣欣向榮，日用類書的出版亦可見此一傾向。⁶²

如序所示，《居家必備》包含的內容範圍與前述居家類書籍相似，皆偏向仕紳階層治理家業的需求，其中如「清課」等卷帙，錄有自南宋趙希鵠至晚明屠隆、文震亨等關於士人起居用著作，訴求的對象十分明顯。上述三種以「齊家」為主旨的日用類書，除了內容與福建版不同外，在編排上，更可見雲泥之別。最明顯之處在於以文字為主，圖示較少，版面鬆闊，字型較大，全頁一體，未見上下區隔。另傳抄前人著作時，注明出處，且錄文較為完整，而福建版日用類書割取局部，填入各分類細目中，不僅細碎，原文脈絡也不存。如前所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於晚明若干出版品隨意採摭、抹去出典的作法，極為不滿，所指即如福建版日用類書。第三點則自內容及版面安排上，見出成書目的之異。士人型日用類書以學習為目的，除了選取全文以供閱讀外，同類知識齊全。如《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的「為學」部份，自童蒙教育中的穿衣走路至讀書識字後的書簡通式，一應俱全，而寫字相關知識包含在「為學」之中，可見為士子求知成學必備之涵養。與之相對，福建版日用類書將「書法門」獨立出來，與其他眾多門類並列，並無先後主從之別，可見書法知識不是儒家為學之一環，而宛如「侑觴」、「笑談」或「風

⁶¹ 讀書坊刊本藏於台北國家圖書館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心遠堂的版本則見於國家圖書館。關於「讀書坊」與「心遠堂」資料，見杜信孚纂輯，《明代版刻綜錄》，冊7，卷8，頁9下-10上與冊1，卷1，頁14下。「讀書坊」資料另收入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齊魯書社，2001），頁511。

⁶²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pp. 250-253.

月」般皆為時興話題或生活知識，隨時可供翻閱檢索。自目錄的編排上，也可見出福建版日用類書適於翻檢，不須字字閱讀。各門因為分類清晰，標題統一格式，「書法」、「畫譜」等二字門類下，再分上下層，各為四字，如「畫譜門」分上層「丹青妙訣」與下層「畫譜要覽」，其下再有小字注明內容細目，話題性十足。《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目錄則先後次序清楚，知識有主從之別，彷彿儒家成學有其步驟，但未在視覺上顧及檢索之便利（圖八、九）。

明代中後期以降，尚有《多能鄙事》、《便民圖纂》與《日用便覽事類全集》等日用類書存世，惟更偏向實用性，尤以農業知識所佔比例最多，與福建日用類書的區別更大，不再多談。⁶³而有名的《三才圖會》與知識階層緊密相關，編者王圻進士出身，序言作者多人，或為官僚士大夫，或為著名文士。《三才圖會》提供完整的知識體系，並佐以圖繪；其一序言讚其「左圖右史」，復興古典知識傳統；另一序言指責市肆之書多可汗牛，但包羅萬象且細目繁多者，只配「佐談笑」，相應之下，《三才圖會》方是圖像與文字並列的中國正統知識。⁶⁴如此一書顯然與福建書坊割裂引文且知識破碎的日用類書大相逕庭，序言作者貶抑的對象，或許就是福建版日用類書。即就品質而言，《三才圖會》雖無套色等繁複印刷技術，但圖繪精美，版刻細緻，福建版日用類書去其千里，難以企及。

綜合上述，建陽所出日用類書特色鮮明，市場區隔清楚，顯然能滿足時人某種需求。就編排及內容看來，該種日用類書供檢索之用，話題性強，非知識學習，與傳統書籍純文字性質也有差別，著重視覺性設計，符合時人視覺思考的潮流。所預設的讀者並非中國傳統社會菁英階層，也就是士大夫階層的主要來源——有土地有家業的鄉紳，投射出的生活形態也不是耕讀生活，而習染城市文化的氣息。換言之，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購買者雖不一

⁶³ 例如，《便民圖纂》，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887-995。正文之後有一出版後記，考察該書的來源與用途，可供參考。

⁶⁴ 見王圻、王思義編集，《三才圖會》，冊上，頁 1-11。

定居住於城市，但該書的編輯策略顯然與瀰漫散佈的城市氣氛有關，為城市繁華後所帶出來的文化效應。

除了經由內容與編排探求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讀者趨向外，討論書籍的消費與讀者，最直接的當然是書價與購買力的問題。根據二本日用類書所列標價，售價分別為一兩與一錢，雖相差極大，但約略可見定價範圍。⁶⁵以晚明書價看來，一錢可稱價廉，一兩則稱中等；書價貴者多為印製精美的名著，以圖為重的書籍也所費不貲，索價二、三兩，並不少見，相較之下，日用類書已近書市價格之底端。⁶⁶再衡諸購買力，雖有學者認為對下層社會而言，書價高不可攀，也有學者將書價與官吏俸祿相比，顯示一般人仍負擔不起。⁶⁷官吏俸祿是否為晚明圖書購買能力最好的測量表，令人懷疑；眾所周知，官員的收入不只俸祿，各種非正式收入與法外回扣遠超帳面上的官方數字，況且晚明各種階層與職業的收入，與各級官僚的薪金並無關聯。以晚明坊刻昌盛之狀看來，書籍在當時確為文化消費中重要的項目，在經濟發達與消費盛行中，家有餘貲者花費數錢，買部日用類書，應非罕見。⁶⁸就像人類學家 James Hayes 的研究，1950、60 年代香港新界地區的下層階級雖無力購書，但只要買得起書的家庭，日用類書正是優先考量。⁶⁹

晚明日用類書的讀者雖因資料缺少，難以框定於某人或某一群人，但若

⁶⁵ 見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頁 87-89。

⁶⁶ 見磯部彰，〈明末における『西遊記』の主體的受容層に関する研究——明代「古典的白話小説」の読者層をめぐる問題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期 44(1980)，頁 55；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 518；大木康，〈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頁 102-108；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pp. 35-37；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卷 85 期 1(1996)，頁 101-118；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pp. 190-192；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2），頁 262-266。

⁶⁷ 見磯部彰，〈明末における『西遊記』の主體的受容層に関する研究——明代「古典的白話小説」の読者層をめぐる問題について〉，頁 55-56；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頁 116-118。

⁶⁸ 見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pp. 35-37。

⁶⁹ James Hayes, "Specialist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87-88。

干蛛絲馬跡，仍堪揣摩。章回小說《醒世姻緣傳》中，有一出身地方官吏家庭的浪蕩子弟，名喚晁源，平日無意於詩書，程度僅及《千字文》類童蒙用書。一日忽病，醫生到府診斷把脈之時，須借書籍墊之，醫生問道《繙紳錄》，侍女卻取來春宮版畫與猥褻小說。次回，換以《萬事不求人》等日用類書。⁷⁰今之學者考訂《醒世姻緣傳》作於清初，作者身歷晚明，文中描寫之社會情狀，應有晚明色彩。⁷¹由上述情節看來，作者認為日用類書所需之教育程度不高，能懂《千字文》即可，所謂「粗識文墨」者，大概如是；⁷²再者，日用類書與黃色書刊同屬晁源藏書，正是閒書之流，符合其不讀正書之紈綺個性。

《醒世姻緣傳》的場景發生於山東武城與江蘇華亭，福建版日用類書的流通似乎廣及大江南北。對於研究中國印刷文化的學者而言，出版事業的網絡因為少了關於刊刻數目、銷售數量與行銷管道的具體資料，而難窺全貌，所能掌握的是版本的多少、版刻的來源、書坊與書市的狀況。研究晚明福建坊刻的學者爬梳多種資料後，有以下成果：若干福建書商在南京等江南大城及北京設有書舖，或能經銷福建書籍，而余象斗等人對於南京出版事業十分熟習，屢屢翻刻「京本」書籍，二地出版的流通概可想見。學者甚至認為晚明中國中部與南部已形成統一的書籍市場，日用類書的流傳遂不限於福建。福建的書籍市場畢竟比不上江南此一人文薈萃且繁華爛漫的地區，僅靠福建一地識字人口恐難以支撐建陽坊刻，福建書籍最大的市場應該也是江南地區。⁷³

⁷⁰ 見西周生撰，黃肅秋校注，《醒世姻緣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一、二回。小川陽一在其書中，已經引用此一段落，惟討論角度不同。見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頁43-44。「不求人」等書名是福建版日用類書才用的標題，見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頁641-658。

⁷¹ 見徐復嶺，《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濟南：齊魯書社，1993），頁1-31。

⁷² 《千字文》與《三字經》、《百家姓》為明清最常見之童蒙用書，讀熟後可認識一千字。見Evelyn S. Rawski,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29-31.

⁷³ 見蕭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中）〉，頁215；蕭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下）〉，頁244-246；繆詠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頁392；金文京，〈湯賓尹與晚明商業出版〉，頁81-83；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pp. 149-150, 250-253.

至於所謂「粗識文墨」之人，在晚明所佔比例與人口數也因缺乏直接資料，難以確定。然而，今日學界公認晚明因經濟發達等因素，識字人口增加，雖然各種研究所得數字皆未超過百分之十，但對於當時社會及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前言之新興出版品或與之相關。⁷⁴另研究者提出「功能識字能力」的概念，指出一般人識字讀書非為進舉或成學，而是因應生活所需，因此許多人必須識字而不一定能寫像樣文章。學習一技之長必得讀懂淺顯文字，如大夫、算命師、風水師、帳房先生、專業寫信人或主導婚喪宗教禮儀的師公等，這些現代稱為專門技術人(specialists)，普遍存在明清中國的城市與村落中，連婦女學習繡花亦須識字。⁷⁵這些功能性識字人口手中若有閒錢，應能買書，也是文化性消費的成員之一，突破傳統將識字與文化消費人口侷限於文人士大夫階層的觀念。

在 David Johnson 關於明清書寫與口傳文化的論文中，將中國社會依照教育程度(Education / Literacy)與包括經濟水平之社會支配力(Dominance)各分三級，因此遂有九等的差別。以教育程度而言，受古典教育的為最高一級，其下尚有「識字」(Literate)一層，方至文盲。此一中層或功能性識字人口橫跨傳統士農工商階級，而具有經濟能力享受文化消費的人口亦是如此。⁷⁶這也是福建版日用類書書名或序言中所言之「四民」或「士民」，⁷⁷期望橫跨階層，盡量趨近社會中會讀書又能消費的人口。前言晁源雖然心在書外，但仍讀書備考，家中也因舉人父親補上縣官而更轉富饒。另城市中的中小商人或作坊

⁷⁴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pp. 34-41.

⁷⁵ Evelyn S.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p. 1-17; David Johnson, "Communication, Class, 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38-39, 54-65; James Hayes, "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 pp. 93-111; Grace S. Fong, "Female Hands: Embroidery as 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發表於「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11月21-23日。

⁷⁶ David Johnson, "Communication, Class, 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55-67.

⁷⁷ 見坂出祥伸，〈解說——明代日用類書について〉，頁7-8。

主人，以及居住鄉下的地主階層，皆是福建版日用類書的潛在購買者。

綜合前述，福建版日用類書所顯示的閱讀方式與書籍樣貌，與傳統書籍不同，應有其編輯策略與市場定位。晚明下層民眾或溫飽難顧，或衣食僅足，斷無文化消費能力；位於識字人口頂端的士大夫階層，毋須消費福建版日用類書般廉價又粗淺書籍，如需類書，《三才圖會》更為適宜，即使是日用類書，尙有如《居家必備》等多種選擇；不具深厚學養的富裕中人買得起多種書籍，價值一兩的福建版日用類書，自可消費，但選擇也多。福建版日用類書作為一種新興出版物，在傳統制舉書籍、詩詞文集與類書外，提供粗識文墨且略具餘貲人士接觸書籍的機會。如此屬性之社會人在晚明前早已見之，但大量出現於晚明，促使書籍市場與文化消費產生巨大變化，福建版日用類書成為新的消費對象，也顯現新的書籍消費型態。此種消費根植於當時社會的流行風潮，在傳統的知識體系、讀書形態與耕讀生活外，新的生活與知識定義浮上論述層面，在社會空間中流佈。下文將藉著書畫門的討論更深入晚明對於生活與知識的新認識，同時在比較他種藝術類消費品後，希望對於福建版日用類書所顯示的讀者與社會空間有更多了解，並透過視覺物品與藝術知識的消費，審視當時的社會區隔(social differentiation)。

三、藝術、社會生活與時興話題： 「書法門」與「畫譜門」

「書法門」與「畫譜門」普見於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多半書法在前，畫譜在後，二者相連。「書法門」上層多為書寫須知及字體範例，文字與圖像參半，下層為永字八法與楷法示範，則以圖示為主。「畫譜門」上層為賞畫或繪畫要訣，多為文字，包括各種基本知識，例如「寫真祕訣」等，下層是畫譜，有梅、竹譜，也有如畫幅般完整的山水與花鳥畫，偶見人物與畜獸。

書畫門成為福建版日用類書的標準內容，顯見當時之需，而書內其它相關條目也具體將書畫編入日常生活中，不須特別解釋與交代，已成社會實踐

的一部份。例如，在良辰吉日的選擇上，肖像畫的繪製亦是其一。⁷⁸就今存畫作看來，自晚明後，確實有許多祖宗像或行樂圖傳世，個像、群像皆有，跨越社會階層與畛域之分。⁷⁹與之相應，日用類書「畫譜門」引錄「寫真祕訣」，包括寫像基本觀念與色彩調配之方。這些片段來自元代王繹的《寫像祕訣》，原文操作性質強，彷彿可據以勾臉斡色，同時也因比附相法，為「寫像」技法增添知識高度。⁸⁰雖然肖像畫的歷史可追溯北宋之前，《寫像祕訣》為今存最早以肖像畫為論述對象的畫論。王繹本為職業肖像畫家，技法高超，就其《楊竹西小像》觀之，寫像不僅寫形，也畫出像主隱士身分的高潔從容。⁸¹「寫真祕訣」傳錄《寫像祕訣》，用意應不在教育畫家，因為肖像畫為專門技術，以師徒之制傳承；反之，錄文顯現的是「畫像」一事已成社會習慣，起碼家有餘錢、識字買書者應該知道。

與繪畫相關的社會習慣尚有數則，皆顯露在書簡格套上。設席款待賓客前，修書一封，借幾幅立軸以增四壁之光；⁸²贈畫友人的客套措詞中，包括水墨畫與四幅山水。⁸³在人事紅塵的應酬交際中，繪畫作為物品已是中介物，或宴飲同歡時妝點氣氛，或人情交換時贈與往來。書法亦是，楊本與法帖在人

⁷⁸ 見徐會灝輯，《萬卷星羅》，卷19，頁12下；《五車拔錦》，《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2，頁36-37。

⁷⁹ 關於祖宗像的研究不少。例如，Jan Stuart, "Introduction," in Jan Stuart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Worshipping the Ancestors: Chinese Commemorative Portraits*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01), pp. 15-116. 其他種類肖像畫的研究，見李國安，〈明末肖像畫製作的兩個社會特徵〉，《藝術學》，期6(1991)，頁119-156；Cheng-hua Wang, "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s: 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s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 (r. 1426-1435),"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8), chapter 4；余輝，〈十七、十八世紀的市民肖像畫〉，《故宮博物院院刊》，期3(2001)，頁38-41。

⁸⁰ 王繹，《寫像祕訣》，收入于安瀾編，《畫論叢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0），頁852-855。

⁸¹ 海老根聰郎，〈王繹·倪瓚筆 楊竹西小像圖卷〉，《國華》，號1255（2001年5月），頁37-39。

⁸² 見徐會灝輯，《萬卷星羅》，卷7，頁7下。

⁸³ 同前註，頁11上；《五車拔錦》，《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1，頁353-354；李光裕輯，《積玉全書》，卷12，頁11下-12上；《萬書淵海》，《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6，頁276。

情世故上也參與一角。⁸⁴類似的書信範例在尺牘集成中也可見到，教導如何寫信求畫。⁸⁵由此可見，繪畫或書法相關文化商品已成固定消費，在人際關係上扮演角色。

原本只有上層階層方能消費欣賞的書畫，在晚明時期，已進入一般人士的生活。隨著識字人口的增加，能夠欣賞與書寫書法作品的人必然超過前代。一如前述，福建版日用類書中有對聯範式，各種場合與職業一應俱全；對聯作為一種書法形制，想必流傳甚廣。再觀繪畫，因應各種人情與節慶的需求，許多功能清楚的繪畫自明代中期後大量出現，如祝賀壽誕、新婚或退職紀念，或提供新年、端午懸掛之用。⁸⁶據研究，明中葉以來，慶祝生日誕辰已成社會習俗，不但年齡下降，階層愈廣，送畫或送字成為人之常情。⁸⁷再如劉若愚《酌中志》記載，晚明萬曆至崇禎年間內廷組織與宮中生活，對於節慶活動有所描寫，初一正旦懸掛天官、鍾馗圖像，端午則見天師或仙人驅除五毒。⁸⁸另據文震亨《長物志》，在其「懸畫月令」一節中，教導如何依照歲時節令懸掛畫軸，新年掛天官、古賢畫像，端午懸鍾馗或艾草、五毒之類。⁸⁹劉若愚代表宮廷，文震亨所提多是宋、元名畫，依時令選換掛之，年中十餘次，皆非尋常人家供養得起。然而二者所言之月令習俗，應橫跨階層藩籬，所選繪畫主題也相似，只是名畫與巨蹟與否，端視個人財富多寡與關係如何。

既然書畫深入社會生活，買賣應該不難，然而尋訪有名畫家的作品，必

⁸⁴ 見徐會灝輯，《萬卷星羅》，卷7，頁10下。

⁸⁵ James Cahill, *The Painter's Practice: How Artists and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5-39; Ann Burkus-Chasson, "Elegant or Common? Chen Hongshou's Birthday Presentation Pictures and His Professional Status," in *Art Bulletin* 76:2 (June 1994), pp. 285-298.

⁸⁶ James Cahill, *The Painter's Practice: How Artists and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 China*, pp. 19-24, 33-35; 石守謙，〈文徵明與大眾文化〉，收入《台灣2002年東亞繪畫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2），頁193-206。

⁸⁷ 邱仲麟，〈誕日稱殤——明清社會的慶壽文化〉，《新史學》，卷11期3（2000年9月），頁101-156。

⁸⁸ 見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177-184。

⁸⁹ 見文震亨著，《長物志校注》（江蘇：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頁222-224。

須透過專人介紹，花費金錢與時間，恐非常態。⁹⁰福建版日用類書中有一啓劄格套，或可顯示當時一般情況：該信央人前往鄰近城市時，代為購買楷書法帖。信中並未指定商號或賣主，城市中書畫相關商品的交易應屬平常。⁹¹再據李日華所記，萬曆中後期為官北京時，《清明上河圖》般的長卷繪畫在京城雜賣鋪中即可買到，價值一兩。⁹²至遲在北宋時期，書畫在大城市的定期市集或店鋪中買賣交易，並非罕見，汴京相國寺之市集即為顯例，晚明之事例有何特殊性？⁹³就李日華及其他相關記載看來，書畫交易在晚明時期更為普及，不僅在京城，江南城市皆有，不僅定期聚集之市集，更有店鋪與攤位，甚至普及到讓李日華吃驚的雜賣鋪。⁹⁴更重要的是，十七、十八世紀描繪城市生活的圖像中，販售書畫古董的店鋪與攤位在都市的通衢大道上屢屢出現，已成都市景觀的一部份，而北宋末年張擇端本的《清明上河圖》並未見書畫買賣的描寫。⁹⁵圖繪不一定反映真實現狀，卻可知在晚明的都市觀念中，書畫等文化商品的流通為都市印象之一，書畫的立即消費性應是當時城市文化的特色，也形構「城市性」。

書畫與生活的密切交涉既為晚明社會文化現象，日用類書的書信活套頗

⁹⁰ James Cahill, *The Painter's Practice*, pp. 35-45.

⁹¹ 徐會瀛輯，《萬卷星羅》，卷7，頁11下。

⁹² 關於北京買賣《清明上河圖》的資料，見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叢書集成續編》，史部，冊39（上海：上海書店，1994），頁739-740，以及《紫桃軒又綴》，《叢書集成續編》，子部，冊89，頁400。李日華傳記資料，見張廷玉等纂，《明史》，頁7400。

⁹³ 關於唐代與北宋大城市中書畫買賣狀況，見Michael Sullivan, "Some Note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t,"《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藝術史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0），頁165-170。

⁹⁴ 見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pp. 133-137; James Cahill, *The Painter's Practice*, pp. 45-50.

⁹⁵ 晚明都市圖像中具體帶出書畫交易地點的作品有下列多種：《皇都積勝圖》、《南都繁會》、《上元燈彩》，以及數卷《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的製作年代較難判斷，其中三卷可能為晚明蘇州職業作坊所作，見遼寧省博物館藏傅仇英《清明上河圖》，以及台北故宮所藏白雲堂本、故宮調字一八五二七本。關於十七、十八世紀都市圖像的研究，見王正華，〈過眼繁華：晚明城市圖、城市觀與文化消費的研究〉（未刊稿，已審查通過，將收入「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世紀至二十世紀」論文集，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頁1-35。

見書畫在人際網絡關係中的痕跡，而專門的「書法門」、「畫譜門」所指向的「生活」又是如何？

「書法門」的字體範例並非首創，早見於《事林廣記》的「文藝類」。《事林廣記》收有草書、篆字、隸書與蒙古字範例，至多七百多字，未見以《說文》般小學知識解釋來源、字義與發音，而教導如何辨識與書寫楷書之外的字體；草書部份尙見口訣，實用性強，收錄蒙古字可見福建版書籍對於新時代的適應。⁹⁶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字體範例最常見篆字，幾乎各本皆有，草字次之，少見隸書。與《事林廣記》最大的差別不在於草、隸書之有無，而是諸家篆書的出現與所舉範例的減少。在晚明日用類書中，篆書至多包括十八種，林林總總，怪字雲集，每一字體多約五十字，少則五字，而以五字最多。其中絕大多數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如「蝌蚪顛項作」、「暖江錦鱗聚」，二者皆「望文生字」，前者學蝌蚪，以圓點細線拼成，後者作游魚群聚狀，字在魚中，視覺趣味重於字形文義（圖十、十一）。⁹⁷《事林廣記》的字體示範尙可提供如字書般學習功能，晚明日用類書篆書範例種類雖多，樣樣皆有，但各取一勺，聊備一格，既無教導作用，又缺學習功效。⁹⁸

至於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為何首重篆書，且視覺趣味高於一切？據研究，晚明因篆刻流行，一則影響書法風格，同時也使篆書廣受注意。篆書源於秦朝統一天下「書同文」之前，字形變化多端，為書體之最，包括許多日常書寫少見字體。晚明文藝風氣原本尙奇，顯現在流行書風上，除了追求視

⁹⁶ 見陳元靚，《事林廣記》，庚集，卷下，頁180-187。關於《事林廣記》中《草書百韻訣》的由來與書法史上的重要性，見硯父，〈元刻《草書百韻訣》箋註〉，《書譜》，期21（1978年4月），頁58-61。謝謝台大藝研所何炎泉同學告知此文。

⁹⁷ 例如，《萬書淵海》，《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6，頁433-445；陳允中編，《新刻群書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明萬曆年間刊本；京都：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谷村文庫收藏），卷18，頁1上-15下；鄭尙玄訂補，《新刻人瑞堂訂補全書備考》（明崇禎年間序刊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傳斯年圖書館微卷，原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卷10，頁7上-7下。

⁹⁸ 例外亦有，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積玉全書》中收有楷、草、篆、隸書《千字文》，歸於明中葉著名書家文徵明名下。李光裕輯，《積玉全書》，卷10，頁1上-15下。

覺上奇特效果外，怪字或異體字的書寫更屬常見。在一片競奇風氣中，篆字正是展現奇異變幻的最好載體，而奇字怪書往往形成視覺上的謎語，在詩酒聚會中，文士以此為娛樂，有如遊戲。⁹⁹上述「暖江錦鱗聚」等，即宛若視覺上的字謎，雖無甚學問，但趣味十足。文士們以奇字下酒，此奇字有典有據，或來自當時字書，如《古文奇字》、《說文長箋》等，¹⁰⁰而福建版日用類書之奇字無根無據，趨向視覺性與通俗性。

由此觀之，「書法門」並非專為學習書法而成立，然內中「永字八法」與楷書示範又作何解釋？「永字八法」來源不明，據唐代貞元年間(785-804)書家韓方明所言，八法起源甚早，歷東漢崔瑗、六朝鍾繇、王羲之等人，至唐代張旭始弘揚之，因「永字」概括楷書筆法，書法之妙，由此成之。¹⁰¹其後元初僧人釋溥光之《雪庵字要》，推許唐代著名書家張旭首創，溥光並發揚光大，將八法推演成三十二形勢。¹⁰²以「永字」寫法作為楷書落筆基礎想必流傳久遠，崔瑗等起源論說真實性難究，但溥光的定制廣為後人認識，明代中期李淳即如此認為。¹⁰³

以日用類書而言，元代《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已收「永字八法」，作為「寫字」一環，取名「神人永字八法」，來自東漢書家蔡邕於嵩山石室中受神人八法的傳說，與溥光所言並不相同。細目冠名為「李陽冰筆訣」，解

⁹⁹ 關於晚明書風與篆刻的狀況，見 Qianshen Bai, *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0-71.

¹⁰⁰ 見白謙慎，〈明末清初書法中書寫異體字風氣的研究〉，《書論》，號 32 (2001)，頁 181-187；Qianshen Bai, *ibid.*, p. 67。當時奇字多指篆、隸字體的多種變化或一字多種寫法的異體字，如朱謀瑋，《古文奇字》，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2，冊 14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頁 105-186；郭一經，《字學三正》，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2，冊 14，頁 187-348；趙宦光，《說文長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冊 195、196。

¹⁰¹ 見韓方明，《授筆要說》，收入《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頁 286。

¹⁰² 見釋溥光，《雪庵字要》，收入崔爾平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頁 186-192。

¹⁰³ 見李淳，《大字結構八十四法》，收入崔爾平編，《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頁 66。

說側、勒、努等八種筆劃寫法要訣。¹⁰⁴李陽冰，唐代書家，以篆書聞名，所謂「筆訣」應為傳稱。其後《居家必備》引之，內容雷同。¹⁰⁵

若干福建版日用類書也錄有「永字八法」，如《萬書淵海》、《五車拔錦》，內收蔡邕之神人八法，並言其後傳授崔瑗與其女蔡琰，偽託成份居多。觀其內容，與《居家必備》等書不同，但與《三才圖會》中之「永字八法」局部重疊。¹⁰⁶《萬書淵海》等版本尚包括「永字八法」圖示及「變化七十二筆法圖」，也與《三才圖會》主旨相似，但諸多細節的差別，排除二者直接的傳抄關係，恐是時代風尚使然。《三才圖會》「人事」部份尚有草、隸、篆字用筆與識字訣竅等內容，匯集字數甚至上千，遠超過福建版日用類書，可作小型字書看待。《萬書淵海》等是福建版日用類書中收錄最多筆法圖示的版本，許多僅有「永字八法」之永字而已，既無七十二筆法，又無文字解說。《萬書淵海》的書學實用性應比同類日用類書高，僅用「永字」單一圖示充數者，實用性少，話題性多。¹⁰⁷

《萬書淵海》、《五車拔錦》的楷書示範約四十字，也居同類書籍之冠。這些字以顏真卿書風寫成，皆為大楷，筆畫粗黑，字形外撇，旁書口訣（圖十二）。晚明學書次第已成習慣定制，嘉靖朝(1522-1566)書家豐坊在其《童學書程》中，教導八歲小兒初學書法時，應先學顏書大楷，當以顏真卿《中興頌》、《東方朔碑》及蔡襄《萬安橋記》為法。這三種石碑皆為有名之顏體大字，學生可據楊本勾摹。¹⁰⁸《三才圖會》師法其意，連推薦範本也一致。¹⁰⁹

¹⁰⁴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甲集，頁30上-33下。關於「神人八法」的傳說，見伏見沖敬，〈永字八法〉，《書道史點描》（東京：二玄社，1979），頁145-158。感謝台大藝研所何炎泉同學告知此文。

¹⁰⁵ 《居家必備》，卷8，藝學上，頁1上-3下。此處將李陽冰誤寫為李冰陽。

¹⁰⁶ 《萬書淵海》，卷15，頁2上-14上；《五車拔錦》，卷13，頁1下-34上；徐會瀛輯，《萬卷星羅》，卷15，頁1下-13下；《萬寶全書》，卷11，頁2下-7下。王圻、王思義編集，《三才圖會》，人事卷3，頁2上-15上。

¹⁰⁷ 例如，陳允中編，《新刻群書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卷18，頁1下；《鼎鏡崇文閣彙纂士民捷用分類學府全編》（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1607)刊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紙燒本，原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卷16，頁1下。

¹⁰⁸ 見豐坊，《童學書程》，收入《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頁97-102。

由此觀之，福建版日用類書確實反應時人風氣，其讀者也一如前言偏向略識文墨者，不具深度與學問。儘管《萬書淵海》等福建版日用類書為學習寫字者提供楷書字範，或可據而習之，然學書一事畢竟不是區區數十字可涵蓋，遑論他種日用類書所示甚至不超過十個字。¹¹⁰晚明學書應以法帖、搨本為法，前言書啓活套中倩人代購之，當是為了學書，不一定是欣賞。¹¹¹

既然無關學書，福建版日用類書中數十字楷書範本除了增添項目，求其全備外，或因範字旁有數語評點，提供品評書法的常識。學書與識字本為一體，皆是教育之端，也是為學之始，為己不為人。然在晚明結社結黨盛行、交際應酬頻繁之時，個人手書似乎盡在他人目光之下，晚明流行的善書即勸喻時人莫嘲笑他人書法。¹¹²書法因此成為個人自我呈現的方法之一，其好壞關涉個人在社會之聲望與地位。可以想見，除了本人書寫優劣外，擁有能力品評他人手書，也是社會生活中必備技能。尤其是在身分浮動不定、階層界限模糊的晚明社會，個人外在樣貌與延伸而來的才藝表現、社交技巧，在某種程度上決定個人之社會身分。¹¹³

「書法門」在當世各種新興話題中遍取一角以符合潮流的作法，「畫譜門」也可見到。畫譜流行於明代中葉後，各式題材皆有，常見梅、竹、蘭、菊、翎毛與人物等譜。《三才圖會》幾乎全部涵蓋，引用萬曆中期周履靖所編之畫譜，如寫梅之《羅浮幻質》、蘭花的《九畹遺容》與翎毛《春谷嚶翔》

¹⁰⁹ 王圻、王思義編集，《三才圖會》，人事卷4，頁16下。另董其昌也提倡學書當自楷法始，見汪慶正，〈董其昌法書刻帖簡述〉，收入 Wai-kam Ho, ed.,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 vol. 2 (Kansas Cit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1994), p. 337.

¹¹⁰ 例如，陳允中編，《新刻群書摘要士民使用一事不求人》，卷18，頁1下-6上。

¹¹¹ 關於晚明書法作品與法帖的流通，大野修作，《書論と中国文学》（東京：研文出版社，2001），頁262-264；王靖憲，〈明代叢帖綜述〉，收入啓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集13（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1-2；增田知之，〈明代における法帖の刊行と蘇州文氏一族〉，《東洋史研究》，卷62號1（2003年7月），頁43-48。

¹¹² 見 Sakai Tadao, "Confucianism and Popular Educational Works," p. 355.

¹¹³ 關於晚明浮動的社會身分，見岸本美緒，〈明清時代の身分感覺〉，收入氏著，《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頁403-428；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第2章。

等書。¹¹⁴福建版日用類書中僅有少數版本包括多種畫譜，多數只有梅、竹，且在圖樣範示上，數量遠遜。¹¹⁵梅、竹二譜最為尋常，本為畫譜之基礎。梅譜首見於南宋末年，竹譜則是元代，代表梅、竹作為繪畫題材在南宋至元代的定型化與普及化，更因包括諸種解說與梅竹式樣，無論就理論或創作層次，皆可見畫科之完備。例如，今存最早的《梅花喜神譜》雖未必用為畫譜，但已見畫梅之專業化，姿勢與情態百種，琳琅滿目，窮盡其狀，李衍的《竹譜》亦然。¹¹⁶反觀之，福建版日用類書中少數幾幅梅、竹圖示與口訣，難以訓練出真正的畫家。例如，包含最多梅譜資料的《五車萬寶全書》，也不過三十餘種梅花圖示，且畫法低劣，物象難成。¹¹⁷由此可見，福建版日用類書的梅、竹譜，只是給讀者看看何謂畫譜，知道近日風行所在，有一點參與感（圖十三、十四）。

除了梅、竹譜外，「畫譜門」尚有全幅木刻圖繪，題材多為山水、花鳥，只有二幅畜獸，少見人物、界畫。以山水、花鳥為重，與時代風尚合流（圖十五、十六）。晚明畫壇「主元論」專擅勝場，以元代文人畫風與美學為依歸，講究筆墨意趣，不重技巧，文人式水墨山水獨宗天下，甚而貶抑以部署結構為長之人物畫與界畫。此種主流論述普見於當時文人畫論，雖有福建文人謝

¹¹⁴ 王圻、王思義編集，《三才圖會》，人事卷4，頁27上-40下。周履靖，《羅浮幻質》，收入《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14（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頁697-736；周履靖，《九畹遺容》，《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15，頁275-316；周履靖，《春谷嚶翔》，《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13，頁437-484。

¹¹⁵ 例外見《新鐫天下備覽文林類記萬書萃寶》（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1596)刊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紙燒本，原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卷16，頁5下-15上；鄭尚玄訂補，《新刻人瑞堂訂補全書備考》，卷8，頁7上-8下。前者尚包括菊與翎毛譜，後者多出蘭與翎毛，但份量皆少。

¹¹⁶ 宋伯仁，《梅花喜神譜》，《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14，頁347-500；李衍，《竹譜》，《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16，頁133-234。相關研究見島田修二郎，〈《松齋梅譜》解題〉，《松齋梅譜》（広島市：広島市立中央圖書館，1988），頁3-37；陳德馨，〈《梅花喜神譜》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74-80；Maggie Bickford, *Ink Plum: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Scholar-Painting Gen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80-196；陳德馨，〈《梅花喜神譜》——宋伯仁的自我推薦書〉，《美術史研究集刊》，期5（1998），頁123-152。

¹¹⁷ 《五車萬寶全書》，卷11，頁16上-19下。

肇淪等人之質疑，但流風所及，連福建地區出版的日用類書也望風披靡。¹¹⁸

晚明畫譜流行之下，圖繪式畫譜也所在多有。例如，《顧氏畫譜》、《唐詩畫譜》等。前者為顧炳所編，全書採一畫一文形制，先有畫，後有傳稱畫家之傳記。該書包含一百零六幅「畫」，自六朝顧愷之、唐代閻立本到明代中葉林良、文徵明，連同時代之董其昌也蒐羅殆盡，畫後傳記之書寫歸於當時名人筆下，因此可見祁承燦書寫董其昌小傳（圖十七、十八）。¹¹⁹姑且不論該書所收書畫之真偽，也不管風格傳稱正確與否，晚明此類書籍的刊行，可見社會對於繪畫的需求，既需要繪畫知識，也需要繪畫作品以供欣賞。凡是買不起卷軸繪畫的人，或是財力許可而知識層面卻難以跟上的人，《顧氏畫譜》即是另一種選擇，提供高級文化商品的一抹影子。¹²⁰透過所謂的顧愷之與董其昌，讀者彷彿觸摸到另一個階層人士的生活。

《唐詩畫譜》藉由對於有名詩句的詮釋，企圖捕捉歷來文人畫論中「詩畫合一」的最高境界。晚明本就流行唐詩，畫譜所選詩句傾向敘事清晰、意象鮮明者，取其易於入畫，而非晦澀朦朧。¹²¹畫中人物姿勢清楚，演出詩中故事情節，而山水部份強調筆法，各家俱全，如馬遠「斧劈皴」、米家「雨點皴」與王蒙「牛毛皴」，墨法也有（圖十九、二十）。¹²²在木刻版畫上一點一劃刻出繪畫般皴線與墨染本非易事，該畫譜反其道而行，顯見接受當時畫壇重視筆墨之風。《唐詩畫譜》無論詩畫皆符合流行，試圖分享難以參與

¹¹⁸ 見王正華，〈從陳洪綬的《畫論》看晚明浙江畫壇：兼論江南繪畫網絡與區域競爭〉，收入《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頁 339-353。

¹¹⁹ 見顧炳，《顧氏畫譜》（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祁承燦（1565-1628），浙江山陰人，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祁彪佳之父，小傳見朱彝尊，《明詩綜》，卷 59，頁 23 下；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續修四庫全書》，冊 1698，卷 16，頁 37 下-38 下。祁承燦之文應為偽託，不可盡信。

¹²⁰ 見 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134-148.

¹²¹ 關於晚明唐詩普及狀況，見劉巧楨，〈晚明蘇州繪畫〉（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頁 115-117；唐國球，〈試論《唐詩歸》的編集、版行及其詩學意義〉，《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頁 32-42。

¹²² 見黃鳳池輯，《唐詩畫譜》，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的文人氣圍與繪畫欣賞。

福建版日用類書也參與流行，因此有畫譜部份，且各版本重疊性高，所選畫幅相當一致。¹²³這些木刻版畫就品質而言，遠遜上述二本畫譜，與主流畫風之間的距離，也不可以道里計。除了二幅可見米家墨點山水，四季花鳥邊角出枝構圖，勉強符合主流畫史外，其餘筆法構圖皆不相似（見圖十五、十六）。如此拙劣，為何仍堅持選入日用類書中，更可見風行草偃之效，為了吸引讀者，不得不然。若干版本的「諸夷門」甚且以朱色套版，加上少許顏色，企圖增添一絲當時出版業先進技術的氣息，不然既增加成本，又效果不大，所為何來，令人費解。¹²⁴

前此研究，強調福建版日用類書的實用性質，有如手冊般功能。其中若干門類或許真可按書操作，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問題，或是教導入門技術，但由上述的討論已可見出福建版日用類書的話題性與流行性，其作用顯然與其他種類與版本的日用類書不同。尤其藉由本文對於書畫門的仔細討論後，福建版日用類書參與社會潮流的企圖更形清楚，並大大減低其實用操作與童蒙教育的可能性。由此可見，多種年代與版本的日用類書所涵括與指稱的「生活」並非同質不變，福建版日用類書所指向的晚明生活並非今日認定之「食衣住行」日常生活或家居生活，而是極為重視交際應酬與流行話題的社會生活。言其「子弟文化」過於強調其中踰越正常生活而難以規範限制的特性，因為此種與城市文化息息相關的社會生活，恐怕已是主流生活，否則風向靈敏、以獲利為主要考量的福建書商不會同聲一氣地出版類似書籍。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存在於一個巨大而密實的人際網絡中，交織的是人情世故，是場面交際，而不是縉紳家業、問學求道或生活上的實際問題。

¹²³ 例外見鄭尙玄訂補，《新刻人瑞堂訂補全書備考》，卷8，頁1下-6下。此一刊本的畫譜圖繪為所見最精良者，全以團扇形狀入畫，頗具南宋繪畫的特色。

¹²⁴ 例如，博覽子輯，《博考全書》，卷2。

四、藝術知識、社會區隔與另類社會空間： 「書法門」與「畫譜門」

就生活層面而言，福建版日用類書呈現的是社會流行與普遍趨勢，橫跨上、中階層之分，不識字人口或衣食難保之人自然無力追逐流行，但識字人口中凡有能力消費書籍者皆可參與，彷彿是晚明社會文化的公約數(denominator)。然而，如果就知識內容觀之，該種書籍所顯示的不只是社會文化的共相，也是社會階層的區隔，當有能力之人皆被流風薰染時，不同階層所佔的位置更形清楚，尤其顯現在關於書畫知識這類文化資本的擁有上。換言之，有能力掌握主流藝術知識者，除了家世背景的承襲與教育程度的薰陶外，端靠鉅額金錢的投入，換取文化資本。缺乏大量資本的功能性識字人口，在主流文化的分享與參與上，恐怕難以入門，福建版日用類書的知識內容即顯示此點。

再者，從生活層面的探討可見福建版日用類書如何企圖趕上潮流，符合社會已有之期望。然而，若以知識形成與流通的角度來說，這些書籍的內容不只反映當時社會狀況，更具有規範性(prescriptive)，參與建構晚明的社會文化。換言之，福建版日用類書有積極的文化建構性，且落實在知識層面上。這些書籍所包含的書畫知識在與他書比較對照後，可見不同的知識形態，差異之大，難以見容。彷彿不同的人群流通著不同的藝術知識，在此中隱然浮現趨於分化的社會空間，彼此之間的輪廓雖無法截然劃分，但各自統有之勢十分清楚。

晚明藝術知識的流通與藝術論述的形成有二種管道，其一是文人結社交際的盛行，藝術相關言論透過人際網絡形成共識或爭論；其二與出版文化息息相關，簡言之，就是知識的商業化。二種方式想必互動頻仍，重疊交錯，始末難分，共同構成晚明藝術言論市場。¹²⁵試舉二例說明之：董其昌關於書

¹²⁵ 見王正華，〈從陳洪綬的《畫論》看晚明浙江畫壇：兼論江南繪畫網絡與區域競爭〉，頁 339-353。

畫的言論原先多為題於書畫卷軸上的跋語，在友朋聚會的場合中寫下，可經由口語交談，流傳於文士交遊圈。其後輯成《畫旨》一書，於其生前二次刊刻出版，成為商業化知識，讀者也可在人際往來中，以言說方式傳遞其見解。¹²⁶再者，晚明多種標榜生活美學品味書籍的出現，公開文人物質生活中具體使用的各式物品與其擺設，儼然為商業化知識，具有生活指導作用，《長物志》與《遵生八箋》即為此中名著。¹²⁷由《長物志》書前沈春澤序言看來，書中陳述的意見未嘗不反應文士交際圈之共識。¹²⁸

福建版日用類書內容的口傳管道難以追溯，但知識商業化的性質十分清楚。該類書籍剪裁來自他書的內容，重新編寫後，成為教導最近流行動向的文化商品；讀者可據以在社交場合中與人應對發言，娛樂彼此，妝點自己的城市氣息。此種知識並非傳統掌控在朝廷與官方手中的科考、治國或學術智識，而是與社會生活緊密結合的常識。商業化的知識可經由買賣行為取得，日漸形成一套眾人遵行的社會規範，一則促成流行風尚，使得階層的跨越轉趨可能，再者也因不同知識流通於不同人群，形成各自發展的社會空間，雖時有對話，但仍形勢分明。

《長物志》中的知識在於標榜文士高雅的生活品味，藉以區隔徒有財富而無文化水準的新富人士，晚明多種書籍所稱的「賞鑒家」與「好事家」之別，即在於此。據《長物志》解釋，賞鑒家既有收藏，也知識鑒與閱玩，更能裝裱與銓次。反之，好事之徒只有收藏，卻無相應的賞玩文化，真贗並陳，

另見井上充幸，〈明末の文人李日華の趣味生活——『味水軒日記』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卷 59 號 1（2000 年 6 月），頁 1-28。

¹²⁶ 關於董其昌的書畫題跋與相關著作，見傅申著，錢欣明譯，〈《畫說》作者研究〉，《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頁 44；汪世清，〈《畫說》究為誰著〉，同書，頁 61-62；張子寧，〈董其昌與《唐宋元畫冊》〉，同書，頁 581-590。

¹²⁷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chapters 1-3；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0（2002 年 12 月），頁 12-16、25-51。

¹²⁸ 見文震亨著，《長物志校注》，頁 10-11。

新舊混雜。¹²⁹《長物志》等書所標榜的文士品味，在成為言論市場上的知識後，難保不為好事者群起模仿，成為流行而轉趨通俗，因此學者認為晚明雅俗之間的界線流動不定，時時需要捍衛劃分，品味之雅俗高下遂成為辯證，彼此之間富含張力。¹³⁰

《長物志》的作者文震亨之所以力捍雅俗之別，在於憂心好事者之僭越，模糊原有的身分區隔，真假不分。如此費心地區別雅俗，端在「好事家」有能力取得原屬於「賞鑒家」的生活品味，二者在社會階梯上身分接近，魚目混珠，並非罕見。不論賞鑒或好事，基礎皆在收藏，福建版日用類書的購買者，即使有能力收藏《長物志》所建議的歷代名家碑刻及宋元古畫，也是少數幾件，難如文震亨如數家珍般舉出數十種，甚至上百種。¹³¹更甚者，若以福建版日用類書中的書畫知識看來，與文士交遊圈所熟知的知識相隔甚遠，對於文震亨等文士而言，並無威脅性，也不須區別。

前已言及之書畫門內容，就可看出遙不可及的部份。在篆體奇字的玩賞上，文士趣味的來源在於辨識正統小學知識，這些知識有憑有據，以歷史權威為依靠，而日用類書的讀者所樂在視覺趣味上，不追究來源依據，也不需權威感。再就書法知識而言，《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轉錄姜夔《續書譜》，接近全文引用，此為書法史上有名的著作。¹³²《居家必備》引用李陽冰、歐陽詢與姜夔的書法著作，其中歐陽詢的「三十六法」也是來歷分明的書論。¹³³

《三才圖會》則簡明扼要地指出重要書家流傳衍行之系譜，自東漢蔡邕至宋

¹²⁹ 同前註，頁 135。關於晚明賞鑒家與好事家之分，尚可見謝肇淛，《五雜俎》，《歷代筆記小說集成》（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冊 54，卷 7，頁 26 上-26 下；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26，頁 653-656。

¹³⁰ 見王鴻泰，〈明清士人的生活經營與雅俗的辯證〉，發表於“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 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Academia Sinica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October 25-27, 2002.

¹³¹ 見文震亨著，《長物志校注》，頁 185-188、221。

¹³² 見《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甲集，頁 33 上-40 下。另該書收有《董內直書訣》，不知來處。姜夔之文見《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383-395。

¹³³ 《居家必備》，卷 8，頁 3 下-8 上。歐陽詢之文見《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99-104。

代崔紆，名姓確定，每代之間皆有師承授受關係；另推薦適合不同學書階段的法帖，自八歲至二十五歲，各體皆有，為歷代盛名之作。¹³⁴

上述這些知識頗為符合今日藝術史的理解，但知識的正確與否並非最重要的區別，不同的知識形態或許更值得注意。《三才圖會》等書的知識即使不正確，其知識形態著重有憑有據的傳承來源與確定指稱，提供的知識有名有姓，首尾俱全，明白確定，源流清晰，符合講究歷史傳承與各家系譜的中國知識系統。例如，《三才圖會》所言之書家與法帖，雖不如《長物志》一引不下百種，誇示意味十足，但仍各有所據。再者，《三才圖會》的書法知識區別細緻，大中小楷、篆書與古篆、石鼓與鐘鼎，可見知識體系的完整與成熟。這些都是福建版日用類書所未見，一是援引古代名書家或書論，未見清晰的交代，再則未指出確定法帖或碑刻作品，讀者難以進入早在晚明之前體系已臻完備且鑑別細緻的書學傳統。

在「書法門」見到的知識差異與社會區隔，放諸「畫譜門」更是清楚。畢竟學書即識字，儘管上下有別，仍是識字階層的共同知識資產，而繪畫知識脫離識字必需的範圍，進入藝術修養與文化消費的層次，更見階層之分。

就畫譜而言，《顧氏畫譜》的作者顧炳，杭州人，職業畫家出身，曾供奉宮廷，在書前他序及譜例中，極言其蒐集名畫之苦心孤詣，彷彿所收作品皆有實物為憑。據今之研究，一百多幅中僅有數幅可與今存作品比對，多為偽作，如唐代韓幹「駿馬」一幅，明顯取自明代宮廷畫家胡聰的作品，與韓幹無關。¹³⁵在眾多作品中，風格拿捏較為接近傳稱畫家者，多屬浙派與宮廷畫家，如林良的老鷹與張路的人物，可見顧炳能掌握的畫風與其背景有密切關聯，也可見杭城一帶仍以浙派畫風最易取得（見圖十七）。顧炳的社會身分與所處地域，與當時畫壇主流松江或吳地文人畫家有所差距，對於文人畫風的認識難免偏差。例如，傳為文徵明的作品中，人物遠大於背景山水，文

¹³⁴ 王圻、王思義編集，《三才圖會》，人事卷4，頁15上-17下。

¹³⁵ 見小林宏光，〈中国絵画史における版画の意義——《顧氏画譜》（1603年刊）にみる歴代名画複製をめぐる〉，《美術史》，期128（1990年3月），頁123-135。

氏非以人物畫聞名，且以今傳畫作看來，人物遠少，技巧不高。再如董其昌之例，該畫根本不可能出自董氏之手，無論就構圖、筆法，皆是南轅北轍，毫無頭緒（見圖十八）。當世畫家尚偏差如此，遑論六朝顧愷之。

由此可見，《顧氏畫譜》非如明清之際董其昌、王鑑等文人畫家「小中現大」式仿古作品，據縮小仿作可判斷宋代范寬、元代王蒙等原畫的收藏，並可評斷收藏者與畫家的鑑賞能力。¹³⁶更何況，《顧氏畫譜》中的畫作既無題字，也無印章，畫幅形制固定，並非常態尺幅，可見所作不是某一幅確定的作品，而是該畫家的普遍風格。因此，《顧氏畫譜》與晚明實際作品的收藏、賞鑒無關，但可據以了解時人之畫史知識與風格觀點。¹³⁷

既與收藏鑒賞無關，《顧氏畫譜》顯然脫離晚明高層文士間的美學論辯與品味鑑別，與《長物志》分屬不同的社會場域。如前所述，晚明書畫言論多為題跋形式，與書畫卷軸的收藏鑑賞唇齒相依，透過文士群聚觀畫品書的社會生活與活動場域，成為主流論述。如此一來，不具收藏能力的人，難以進入品味生活，無法以確定書畫家與作品為談論對象的人，無法進入論述。

然而，《顧氏畫譜》中的傳稱畫風即使無稽，其所形成的知識形態仍根植於正統畫史，主要引用元代夏文彥《圖繪寶鑑》（1365年序刊本）與明代中期韓昂《圖繪寶鑑續編》（1519年序刊本）二書的傳記，自顧愷之開始，以系譜的方式發展，各家有名有姓有傳記。顧炳本人師事周之冕，今北京故

¹³⁶ 所謂「小中現大」，將宋、元古畫縮小複製成冊，取其自小觀大之意，最初見於董其昌書於其《仿宋元人縮本畫及跋》冊前。該冊書畫之真偽尚有爭議，有董其昌、陳廉、王時敏、王翬等說法。依筆者親見，冊中數開畫作的筆墨精妙，如玉之潤，極似董其昌之筆。其後王鑑、王翬等正統派畫家也有「小中現大」畫作存世。關於這類作品的研究，見 Wen C. Fong, *Images of the Mind*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pp. 177-192; 古原宏伸著，王建康譯，〈有關董其昌《小中現大冊》兩三個問題〉，《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頁 594-604；徐邦達，〈王翬《小中現大》冊再考〉，《清初四王畫派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497-504；張子寧，〈《小中現大》析疑〉，《清初四王畫派研究》，頁 505-582；Wen C. Fong and James C. Y. Watt,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6), pp. 474-476.

¹³⁷ 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134-148.

宮博物院尚存其花鳥畫一幅，生平事蹟也載入清初付梓的姜紹書《無聲詩史》。¹³⁸儘管顧炳對於晉唐畫風判斷失據，對於明代文人畫也不夠準確，但《顧氏畫譜》仍在畫史的範圍內形構繪畫知識。《唐詩畫譜》亦然，著重筆墨的特色，甚且到達誇示的地步；晚明蘇州畫壇流行以唐詩為引作畫，詩畫之作有其市場需求與品味價值。¹³⁹無論重視筆墨或以詩入畫，《唐詩畫譜》與主流畫壇及畫史的交涉可見一斑。這二種畫譜在版畫發達的時代，還沾得上「複製」二字，可提供買不起書畫作品的人參與主流繪畫知識與品味氛圍。

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中的畫譜，一如前述，除了墨點法可連上米家山水外，少見與主流畫史的關聯。《顧氏畫譜》的形制雖非書畫常見，尚稱長方，而《萬書淵海》等福建版日用類書中的畫譜，尺幅趨於方正，更不像尋常之卷軸冊形制。在此一正形式中，構圖更形脫離書畫原有的樣貌，反而接近瓷器上的裝飾畫，物象分布均勻，較少疏密、陰陽等繪畫固有之轉折搭換，構圖法則不同（圖二十一）。畫譜稱為「複製」，因其接近繪畫，可捕捉一絲原味。由此觀之，「小中現大」式的仿作，最為接近原作，《顧氏畫譜》次之，而福建版日用類書中的畫譜遠離「繪畫」，言其複製，不如說是另一種視覺商品，與文士收藏鑑賞對象全然無關，處於另一種社會空間中。

除了畫譜所形成的「繪畫」定義與知識外，福建版日用類書的「畫譜門」還收錄多條關於鑑賞與畫史的文字。一如前述，諸如〈識畫訣法〉、〈觀畫訣法〉、〈符熹應評畫〉等九項條目，應傳抄自《事林廣記》；另〈寫山水訣〉來自元代文人畫家黃公望同名著作。中國傳統書籍如地方志等，常見抄錄前代記載，就今日著作權與文字創作的觀點觀之，輾轉翻抄者，似乎在史料價值與創新程度上大大減損，不值一顧。然而，就文字流通的角度觀之，經過歷代傳抄屢屢出現的文字透過閱讀與口傳等社會實踐，其所穿透的社會空間或許更為廣大。更何況，同樣內容的文字條目在不同的書籍出現時，自

¹³⁸ 見小林宏光，〈中国絵画史における版画の意義——《顧氏画譜》（1603年刊）にみる歴代名画複製をめぐる〉，頁124。

¹³⁹ 見劉巧楮，〈晚明蘇州繪畫中的詩畫關係〉，《藝術學》，期6（1991年9月），頁33-103。

上下文、版面設計到流通狀況與閱讀情境皆相異，效用與意義也隨之變化，不能僅以重複無用視之，而忽略其出現形式與成文脈絡。¹⁴⁰換言之，福建版日用類書即使重複轉載他書內容，也有其個別效用與意義，不能等同於原書。

福建版日用類書中關於繪畫鑑賞的知識，多成口訣形式，文字對稱，且分點說明，簡單扼要。〈識畫訣法〉起首便指出六要六長，所謂「六要」，即「氣韻兼力」、「格制俱老」、「變異合時」、「彩繪有澤」、「去來自然」與「師學格知」。此「六要六長」最早見於宋劉道醇《聖朝名畫評》書前序文，全文教導如何識畫賞畫，有其來龍去脈。¹⁴¹然後世日用類書等書籍截取該文局部，斷裂其意，著重以數目為名的口訣，取其容易記誦。連關涉中國傳統繪畫品評最重要的謝赫六法，也脫離其成文之〈古畫品錄〉，¹⁴²如「六要」般，成為四字一組，共二十四字的口訣。福建版日用類書多引之，且題名誤為〈畫有六格〉。¹⁴³此種作法有其歷史因由與流通性，高濂《遵生八箋》在〈論畫〉一文起始處，即出言譏諷「六法三病」、「六要六長」，言其「以之論畫，而畫斯下矣」。高濂，杭州人，雖未進舉，也非有名文士，但因家富貲財，以收藏聞名，且頗具相關文化修養。¹⁴⁴高濂鄙視的當然不是六法與六要的來源，二者皆出自正統畫史論著，而是如福建版日用類書般割裂其文，取其最簡，以供初學者記誦。

〈觀畫訣法〉亦來自〈聖朝名畫評序〉，〈識畫要訣〉取其前，〈觀畫

¹⁴⁰ 此一觀點屢見於 Roger Chartier 的著作，其人為研究法國印刷與閱讀文化的重要學者。見 Roge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pp. 1-24; *Forms and Meanings: Texts,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s from Codex to Comput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pp. 1-24.

¹⁴¹ 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序〉，《聖朝名畫評》，收入《中國書畫全書》，冊 1（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頁 446。

¹⁴² 關於謝赫六法的解釋很多，可參考石守謙，〈賦彩製形——傳統美學思想與藝術批評〉，收入郭繼生主編，《美感與造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 33-36。

¹⁴³ 正確印出〈畫有六法〉而非〈畫有六格〉的版本很少，如余象斗編纂，《三台萬用正宗》，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1599)刊本，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2000），卷 12，頁 13 上-13 下。

¹⁴⁴ 高濂著，趙立勛校注，《遵生八箋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頁 553。高濂家世背景與生平教養，見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pp. 14-16.

訣法〉取其後，但加以選編，並非字字抄錄。該則條目先教導一般觀畫通則，「見短勿詆破求其長，見巧勿譽反尋其拙」，其下多以一句話舉出如何觀賞釋老、花竹、山水與屋木等畫科，如釋老尚莊嚴慈覺、花竹尚豔麗閑瑞等。〈符熹應評畫〉認為「遠山無坡、遠水無波、遠鳥無目」，而「魚者鱗於鮮」、「龍之鱗如錢樣」等。這些簡單的法則運用於鑑賞繪畫作品，指向的多是物象的樣貌，視覺上即可分辨，不需要畫史知識，如圖像學上的辨認或畫家風格的傳承。上述內容皆與畫史無關，也未指出任何確定的畫家或作品。

福建版日用類書將「六法」寫為「六格」，似乎對於中國畫史上最著名的論畫要點並無認識，「六法」之名早已成為常識。再觀其他錯誤，引用黃公望〈寫山水訣〉時，誤寫落字多處。例如，「皴法要滲軟」之「軟」字寫成「較」字，句意不通，缺字缺句的狀況更讓全文難以卒讀。¹⁴⁵〈古今名畫〉條目中將唐代畫家李昭道之名誤寫為李詔道，原文來源之《事林廣記》並無「六格」與「李詔道」等錯誤。〈古今名畫〉中最令人驚訝的錯誤在於將顧愷之大名誤為顧愷，此為中國畫史上最著名的人物畫家，其地位在唐代已定，一如書法史上的王羲之，也是《顧氏畫譜》中起首第一畫家。¹⁴⁶上述錯誤，雖然可見福建版日用類書不求品質的一面，廉價書籍以數量與速度為考量的作法，結果正是如此。然而，如六格、顧愷般錯誤，在技術上並非難以改正，福建版日用類書仍沿用不變，可見並不錙銖計較是否符合正統畫史知識，而這些錯誤的知識自有其存在的社會空間。

更有趣的是，〈古今名畫〉所舉十八位古今名畫家多半來自《事林廣記》同名條目，惟加入「陳子和」之名，名下並書「仙」字，表明以仙道人物畫聞名。在所舉多為晉唐畫家的狀況下，明代畫家陳子和列名其中已非尋常，而選取陳子和為唯一列名的當代畫家，更令人好奇。陳子和，福建浦城人，活躍於十六世紀初中期，歸類為浙派職業畫家，畫作「殊有仙氣」。¹⁴⁷陳子

¹⁴⁵ 黃公望，〈寫山水訣〉，《畫論叢刊》，頁 55-57。

¹⁴⁶ 關於顧愷之的地位，見石守謙，〈賦彩製形——傳統美學思想與藝術批評〉，頁 25。

¹⁴⁷ 關於陳子和與其畫風，見石守謙，〈神幻變化：由福建畫家陳子和看明代道教水墨畫之發展〉，

和之名進入福建版日用類書概因地域接近使然，浦城與建陽同屬福建西北山區，而陳氏在畫史上也確實以仙道人物出名。然而，陳子和早在十六世紀中期後被江南文士們標上「狂態邪學」汙名，打入不可學習、不可欣賞的浙派畫家行列，¹⁴⁸晚明出版的日用類書對其如此支持，實發人深思。

從陳子和的例子來看，即使晚明福建書商對於江南地區的出版並不陌生，而且大江南北與沿海地區的書籍市場已合為一體，建陽出書仍保有特色，不一定全然跟隨江南。更因福建出版業與江南之密切交流，反證福建版日用類書並非不知道江南流行之主流繪畫知識與畫史論述。當顧炳根據正統畫史編選畫家與撰寫傳記時，福建版日用類書仍處於正統畫史論述之外，包括知識內容與形態皆非董其昌、高濂般有能力參與甚至主導主流論述之人所能接受。在重重錯誤與差異中，福建版日用類書建立一個不同於主流書畫論述的社會空間，其讀者雖知道當時的流行風潮，卻在書畫等文化試金石上，與文士等上流階層區隔開來。

五、結論：文化商品與社會空間

將坊刻書籍視為文化商品，殆無疑問，晚明社會在衣食住行基本需求之外，還流行大量的文化商品，書市中的書籍僅為其一。研究這些文化商品最困難之處不在於生產，而在於消費這一端。尤其是福建版日用類書這類低廉又粗劣的出版品，當代文獻既無銷售量與地區資料，又無讀者反應的記載，如何判斷其流通性與社會效用，正考驗著研究者。不過，書籍一如任何商品，生產者對於如何銷售必有一番盤算，自生產之初，即預計市場的需求，心中有預設的消費者。以書籍而論，書商的盤算必然顯現在書籍的細部內容與編

¹⁴⁸ 《美術史研究集刊》，期2(1995)，頁47-74。
Richard Barnhart, "The 'Wild and Heterodox School' of Ming Painting," in Susan Bush and Christian Murck, eds., *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65-396.

纂形式上，因此如何落實至書籍本身，仔細地評估其出版策略與吸引的購買者，應是印刷文化研究重要的一步。再者，各種書籍一出市場，有其競爭者，而書商的策略並非憑空而來，應是在估量市場競爭後的考量。如此一來，蒐集同類書籍，並進而比較其異同，更是確定書籍購買群與流通性的重要方法。書籍內含文本與圖版，因此上述方法自圖文內容及形式分析開始，進而了解其所形成的書籍，再因書籍進入市場後，成為文化商品，必有購買者與讀者，也產生閱讀行為等社會實踐，可從而探測社會空間。

從文化商品探測社會空間，並企圖連結商品形式與社會空間的研究方式，在 Pierre Bourdieu 的名著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中即可見到。他以問卷進行各種階層與職業人群的文化消費調查，選擇的文化商品有音樂與繪畫等，形式上有古典、現代的差別，也有菁英與通俗之分，以此測量不同的消費群眾與社會空間。

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研究雖然沒有問卷可供參考，據以解析不同階層人士與文化商品消費的關係。然而，福建版日用類書內容與編排的雷同，以及品質的一致性，提供成類分析的可能。尤其在仔細討論多種日用類書的內容與形式後，發現福建版日用類書與《事林廣記》最為接近，二者皆為福建出版，有地緣關係，但晚明版本的轉錄傳抄不代表文本的意義相同。福建版日用類書對於知識與生活的定義皆與《事林廣記》不同，市場上的金錢價值也相異。以居家為名的日用類書預設讀者為鄉紳地主，著重如何管理家業、教育子弟，而《三才圖會》的印刷精美，知識屬性較偏向士人階層與傳統定義，皆與福建版日用類書大為不同。上述的日用類書皆根植於中國傳統知識系統及所附著的生活形態，正因為如此，福建書商以敏銳的眼光捕捉到晚明書市中的空隙地帶，出版一種日用類書符合新的社會文化與生活需求。

福建版日用類書的出現確實與晚明新興文化現象息息相關，包括城市作為文化的放射中心，也包括交際應酬與言論市場的重要性。今存三十多種福建版日用類書適時地出現，與這些新興現象對話，一則滿足下層識字人口與

手中有點餘錢人士的需求，在社會生活上能夠知道當時的流行風向，並進而預流入列。再者，這些書籍也加強與延續這些新興文化現象，甚至因為書畫門的內容有別於主流藝術論述，進而發現與形塑另類社會空間。此一社會空間有別於歷來研究最為關心的貴族與文士階層，以及他們的社會文化。換言之，識字與有能力消費文化商品的人口中仍有社會空間的分化，原先視為同質同體，如今看來，社會區隔十分清楚，尤其在藝術文化上。

如此一來，是否可稱福建版日用類書所分化的社會空間屬於「通俗文化」的範疇？一如 Roger Chartier 所言，目前研究上所指的「通俗文化」仍屬智識階層的範圍，尙未碰觸到非識字人口的文化，稱之為「通俗文化」，不免失之荒謬。他並指出前此關於法國通俗文化的研究有二點看似矛盾、實則相通的假設，一則認為通俗文化為獨立的範疇，與菁英文化互不關涉，其二認為菁英文化為社會文化的主控者，一般大眾受其灌輸教化，並進而接受主流文化。二點假設皆確定有一通俗文化的範疇，與菁英文化二元對立，某些物品本質上屬於「通俗文化」，可在所謂「通俗文化」的範圍內理解通俗文化。¹⁴⁹此二點假設放諸晚明文化的研究中，亦可見到。例如，一談到善書、寶卷與日用類書，就想到通俗文化，將之視為屬於「通俗文化」的物品，甚至反映庶民生活，彷彿有一確定的範疇，可稱為「通俗文化」，在其中研究通俗文化即可，不須以對照比較的方式見出書籍間的競爭與協調。再者，認為善書等書籍受到上層文化的重大影響，可代表儒家正統思想的普及與通俗化。換言之，掌控的是儒家教化，善書與日用類書為其通俗化的結果。

事實上，與其將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視為「通俗文化」的當然成份，不如經由細部研究，判斷其讀者與知識性質。一如前述，這些書籍所包括涵蓋的人群，仍是識字與有能力消費文化商品的人口，也有餘暇與能力知道社會生活中的流行風潮。他們雖非上層士人階層，與上層文化有所交流互動，但

¹⁴⁹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p. 3-12; "Popular Appropriation: The Readers and Their Books," in his *Forms and Meanings*, pp. 83-98.

在藝術知識與論述上，即使知道流風在此，卻仍難以進入主流浪頭之中。由此可見，福建版日用類書所吸引的讀者群既與士人文化互動，又呈現各自存在的社會空間，交錯複雜，難以簡化。再者，透過福建版日用類書在書籍市場上與他種日用類書的競爭，方能感覺到不同的消費群與社會空間的存在。同樣地，福建版日用類書內文的輾轉抄錄卻與原書意義大為不同之處，也讓人察覺不同的知識階層與社會空間。這些細部研究所呈現的結果，並不是「通俗文化」與「菁英文化」二元對立的假設所能獲致，也許對於日後相關研究有所助益。

圖 一



說明：「高麗國」形象，出自《五車拔錦》，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1，頁188，下層。

圖二



說明：「日本國」形象，出自《五車拔錦》，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1，頁189，下層。

圖 三



說明：「琴棋書畫」版畫，出自余象斗編纂，《三台萬用正宗》，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3，正文前。

圖 四：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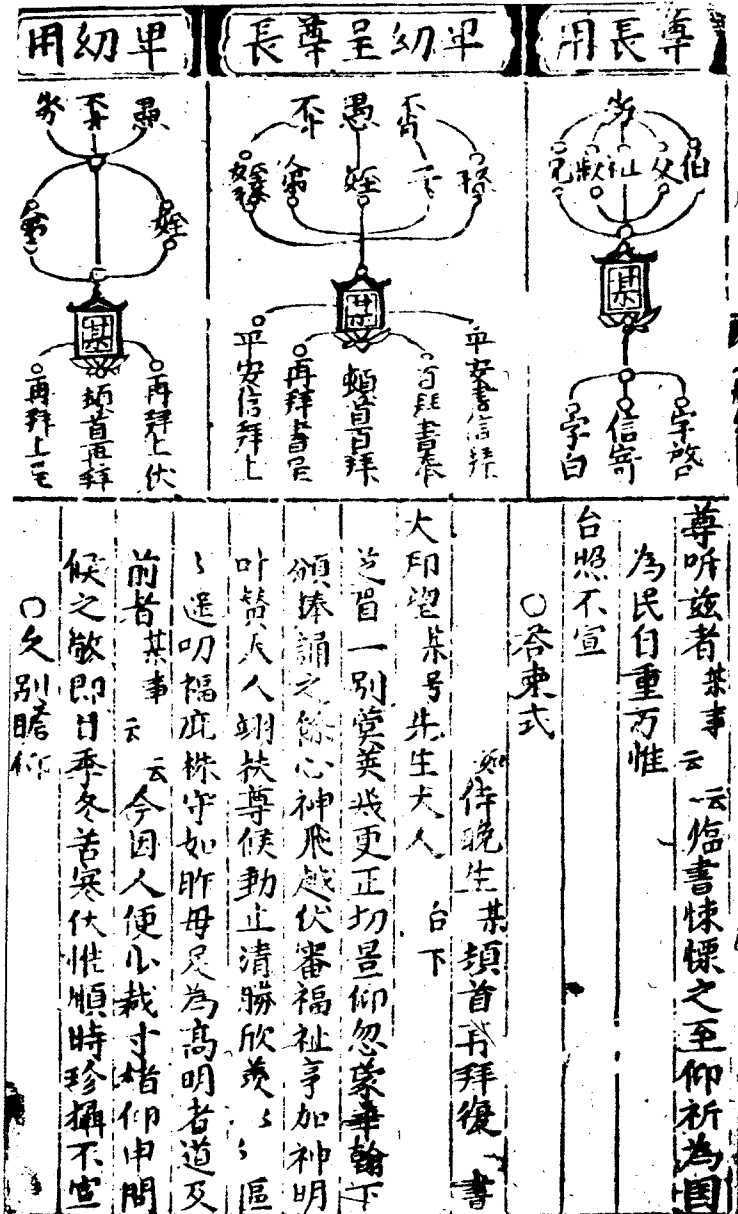
說明：出自余象斗編纂，《三台萬用正宗》，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3，正文前。

圖五：夫子杏壇之圖



說明：出自《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續集，卷4。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西園精舍刊本之複印本。

圖 六



說明：「稱呼範例」，出自《五車拔錦》之「文翰門」，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1，頁310，上層。

圖 七



說明：「書帖範例」，出自《五車拔錦》之「啓劄門」，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1，頁335，下層。

圖 八

十一卷 琴學門	上 琴學須知 內 彈琴上琴定 絃要法俱全	下 太音紀原 內 手指法調絃 泛音并俱全
十卷 祭儀要覽	內 時祭祝文并 各祭文俱全	下 輯宜 內 服制計書信 書并類俱全
十二卷 棋譜門	上 象棋譜式 內 局勢并指明 論要法俱全	下 圍棋譜式 內 棋經總論 局并類俱全
十三卷 書法門	上 落筆須知 內 筆法并篆式 草訣等俱全	下 中書字法 內 把筆要法并 筆勢圖俱全
十四卷 畫譜門	上 丹青妙訣 內 戒畫法 真秘訣俱全	下 畫譜要覽 內 山水竹木飛 禽走獸俱全
十五卷 八譜門		

說明：「目錄範例」，出自《五車拔錦》，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1，頁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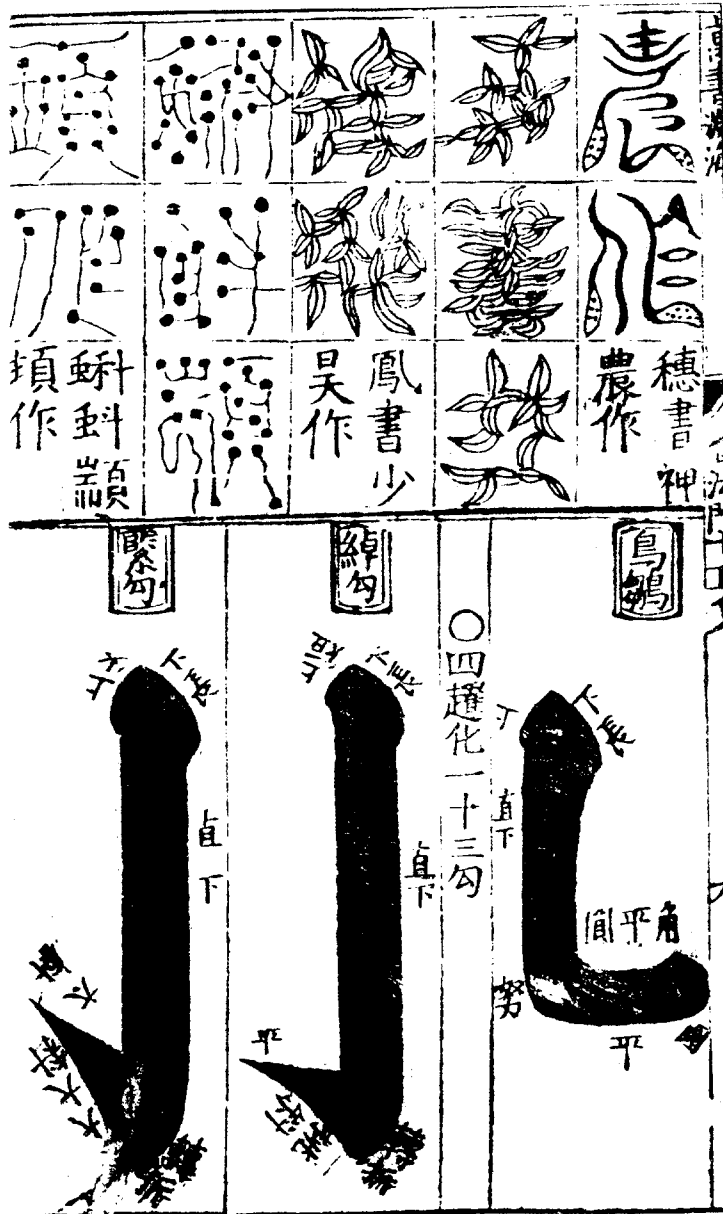
圖 九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甲集目錄	
為學	朱文公童蒙須知
衣服冠履	灑掃涓潔
雜細事宜	訓子帖
塗中事	頽氏家訓
到婺州	真西山教子齋規
着衣	王虛中訓蒙法
入學	叉手
溫書	祇揖
寫字	小兒讀書
改文字	記訓釋字
	說書
	作詩
	朱文公白鹿洞書院教條
五教之目	修身之要
為學之序	接物之要
處事之要	程董二先生學則
	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法
	讀書
	朱子讀書法
	歐陽文忠公讀書法
	程正思論讀書
	作文
	朱子論作文
	東坡論作文
	山谷論作文
	沈隱侯論作文
	呂居仁論作文
	寫字
	神人永字八法側勒努趯策掠豳磔
	姜白石書譜
	董內直書訣
	切韻
	總論
	切韻捷法詩
	三十六字母五音清濁旁通圖

說明：「目錄範例」，出自《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甲集，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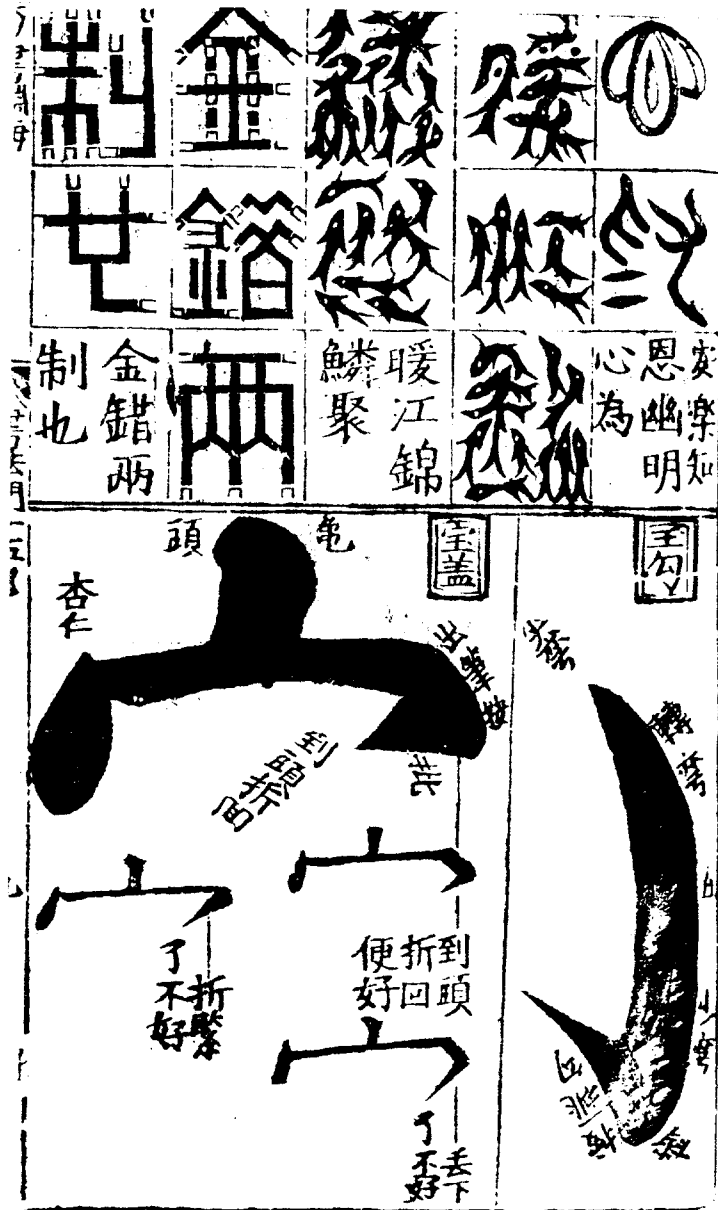
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

圖 十



說明：「蝌蚪顛頤作」，出自《萬書淵海》之「書法門」，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6，頁436，上層。

圖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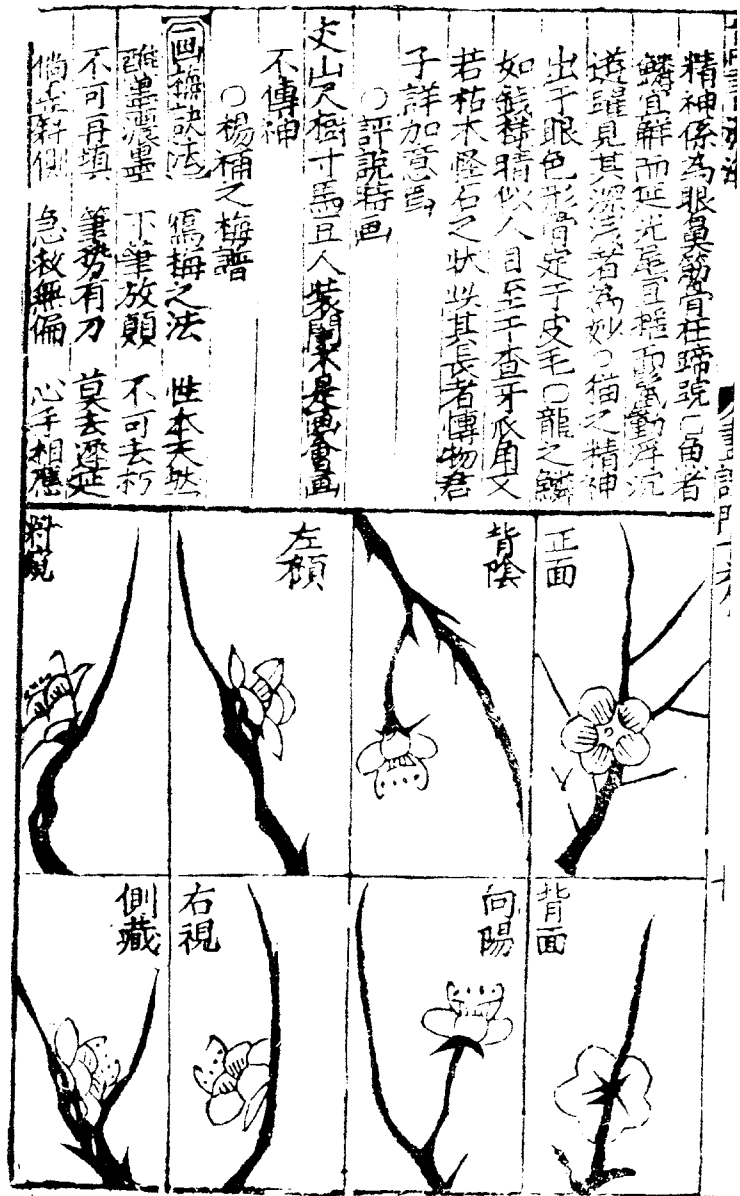
說明：「暖江錦鱗聚」，出自《萬書淵海》之「書法門」，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6，頁441，上層。

圖 十二



說明：「楷書範例」，出自《萬書淵海》之「書法門」，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6，頁453，下層。

圖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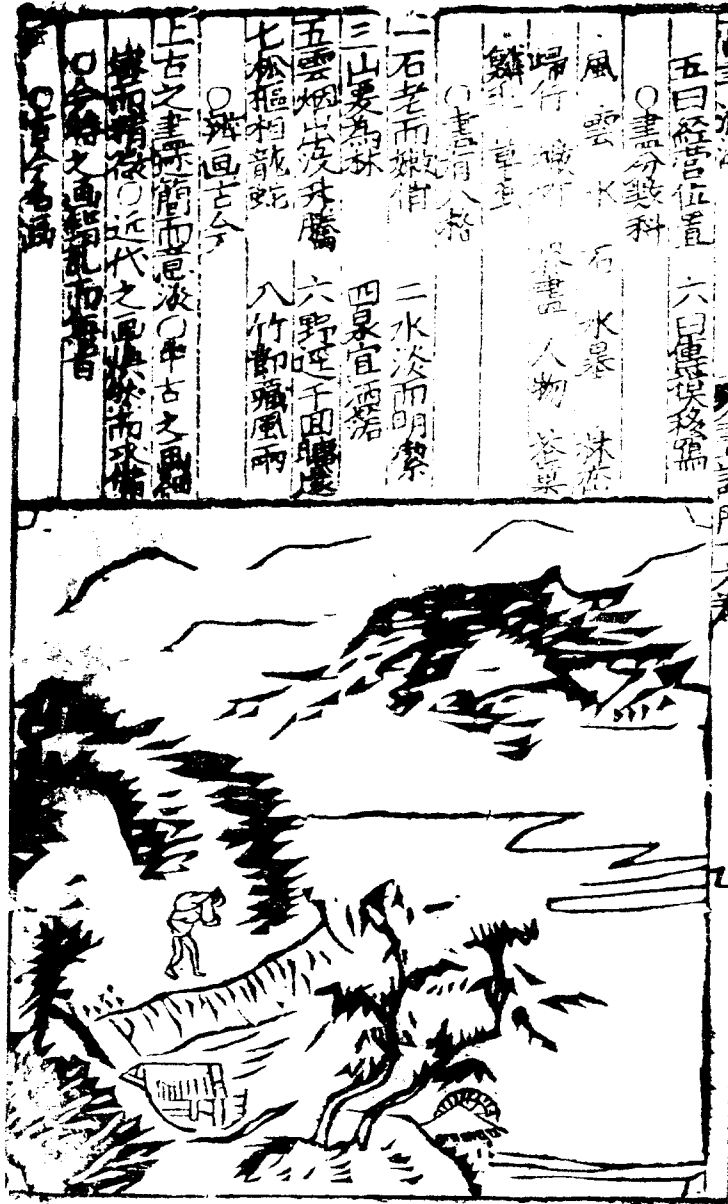
說明：「梅譜範例」，出自《萬書淵海》之「畫譜門」，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7，頁24，下層。

圖 十四



說明：「竹譜範例」，出自《萬書淵海》之「畫譜門」，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7，頁32，下層。

圖 十五



說明：「山水畫範例」，出自《萬書淵海》之「畫譜門」，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7，頁6，下層。

圖 十六



說明：「花鳥畫範例」，出自《萬書淵海》之「畫譜門」，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7，頁15，下層。

圖 十七



說明：「林良鷹畫範例」，見顧炳摹輯，《顧氏畫譜》，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圖 十八



說明：「董其昌畫作範例」，見顧炳摹輯，《顧氏畫譜》，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圖 十九



說明：「米家山水風格」版畫，見黃鳳池輯，《唐詩畫譜》，收於《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頁265，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

圖 二十



說明：「王蒙山水風格」版畫，見黃鳳池輯，《唐詩畫譜》，收於《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頁103，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

圖 二十一



說明：「畫譜範例」，出自《萬書淵海》之「畫譜門」，收於《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7，頁23，下層。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居家必用事類》，嘉靖 39 年(1560)田汝成序刊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
-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61，明刻本。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冊 117，明刻本。
台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184，隆慶二年(1568)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便民圖纂》，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新刻四民便覽萬書萃錦》，明刊本。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 《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使用文林彙錦萬書淵海》，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1610)刊本；
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99。
- 《新刻艾先生天祿閣彙編採精便覽萬寶全書》，明思宗崇禎年間刊本。台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紙燒本，原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 《新刻搜羅五車合併萬寶全書》，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1614)序刊本；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
東京：汲古書院，1999。
- 《新板全補天下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明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
- 《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西園精舍刊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紙燒本，
原藏日本內閣文庫。
- 《新鐫天下備覽文林類記萬書萃寶》，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1596)刊本。台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紙燒本，原藏日本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鍤全補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1597)序刊本；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1999。

《新鐫翰苑士林廣記四民使用學海群玉》，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1607)序刊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紙燒本，原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鼎鍤崇文閣彙纂士民捷用分類學府全編》，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1607)刊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紙燒本，原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增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明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尤侗，《明史外國傳》。台北：學生書局，1977。

文震亨著，陳植校注，楊超伯校訂，《長物志校注》。江蘇：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

王圻、王思義編集，《三才圖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王穉，《寫像祕訣》，收入于安瀾編，《畫論叢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0。

朱謀瑋，《古文奇字》，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輯2，冊14。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朱彝尊，《明詩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朱彝尊，《明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續修四庫全書》，冊1698，隆慶二年(1568)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西周生撰，黃肅秋校注，《醒世姻緣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余象斗編纂，《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台萬用正宗》，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1599)刊本；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2000。

宋伯仁，《梅花喜神譜》，《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14。天津：天津古籍

出版社，1997。

宋詡，《宋氏家要部·家儀部·家規部·燕閒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61。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叢書集成續編》，史部，冊 39。上海：上海書店，1994。

李日華，《紫桃軒又綴》，《叢書集成續編》，子部，冊 89。上海：上海書店，1994。

李光裕輯，《鼎鑄李先生增補四民便用積玉全書》，明思宗崇禎年間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

李衍，《竹譜》，《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 16。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李淳，《大字結構八十四法》，收入崔爾平編，《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收入《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周履靖，《九畹遺容》，收入《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 15。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周履靖，《春谷嚶翔》，收入《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 13。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周履靖，《羅浮幻質》，收入《中國歷代畫譜匯編》，冊 14。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胡文煥編，《山海經圖》，《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76。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徐會瀛輯，《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1600)序刊本；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76。北京：

書日文獻出版社，1988。

高濂著，趙立勛校注，《遵生八箋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

張廷玉等纂，《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

郭一經，《字學三正》，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2，冊 14。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陳元靚，《事林廣記》，至元庚辰鄭氏積誠堂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

陳允中編，《新刻群書摘要士民便用一事不求人》，明萬曆年間刊本。京都：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谷村文庫收藏。

陳田，《明詩紀事》。台北：中華書局，1971。

博覽子輯，《鼎鑄十二方家參訂萬事不求人博考全書》，明神宗萬曆年間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

舒赫德奉撰，《欽定聖朝殉節諸臣傳》。台北：商務印書館，1976。

黃公望，〈寫山水訣〉，《畫論叢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60。

黃鳳池輯，《唐詩畫譜》，收入《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趙宦光，《說文長箋》，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冊 195、196。台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劉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序〉，《聖朝名畫評》，收入《中國書畫全書》，冊 1。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鄭尙玄訂補，《新刻人瑞堂訂補全書備考》，明崇禎年間序刊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微卷，原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鄧仕明輯，《新鐫兩京官板校正錦堂春曉翰林查對天下萬民便覽》，明書林陳德宗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

謝肇淛，《五雜俎》，《歷代筆記小說集成》。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韓方明，《授筆要說》，收入《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1981。

豐坊，《童學書程》，收入《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5。

釋溥光，《雪庵字要》，收入崔爾平編，《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
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

顧炳，《顧氏畫譜》。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二、專書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01。

杜信孚纂輯，《明代版刻綜錄》。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83。

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徐復嶺，《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濟南：齊魯書社，1993。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張滌華，《類書流別》。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陳學文，《明清時代商業書與商人書之研究》。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楊繩信編，《中國版刻綜錄》。咸陽：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

錢謙益，《列潮詩集小傳》。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戴克瑜、唐建華主編，《類書的沿革》。四川：四川省圖書館學會，1981。

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
- 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齊魯書社，2001。
- 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 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社，1995。
- 大野修作，〈書論と中国文学〉。東京：研文出版社，2001。
- 井上進，〈中国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2。
- 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2。
- 酒井忠夫，〈增補中国善書の研究〉。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99。
- Bai, Qianshen. *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Bickford, Maggie. *Ink Plum: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Scholar-Painting Gen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Brokaw, Cynthia,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hcoming.
- Cahill, James. *The Painter's Practice: How Artists and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Chartier, Roger.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Chartier, Roger.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Chartier, Roger. *Forms and Meanings: Texts,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s from Codex to Comput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 Chia, Lucille.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2002.
- Chow, Kai-wing. *Print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Clunas, Craig.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lunas, Craig.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 Fong, Wen C. *Images of the Mind*.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 Fong, Wen C., and James C. Y. Watt.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6.
- Hegel, Robert E.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Ko, Dorothy.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Rawski, Evelyn S.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三、論文

- 王正華，〈從陳洪綬的《畫論》看晚明浙江畫壇：兼論江南繪畫網絡與區域競爭〉，收入《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
- 王正華，〈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0，2002 年 12 月。

- 王正華，〈過眼繁華：晚明城市圖、城市觀與文化消費的研究〉，未刊稿，已審查通過，將收入「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世紀至二十世紀」論文集，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 王靖憲，〈明代叢帖綜述〉，收入啓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集 13。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
-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年 11 月。
- 王鴻泰，〈青樓——中國文化的後花園〉，《當代》，期 137，1999 年 1 月。
- 王鴻泰，〈明清士人的生活經營與雅俗的辯證〉，會議論文，發表於“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 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Academia Sinica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October 25-27, 2002.
- 古原宏伸著，王建康譯，〈有關董其昌《小中現大冊》兩三個問題〉，《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 白謙慎，〈明末清初書法中書寫異體字風氣的研究〉，《書論》，號 32，2001。
- 石守謙，〈賦彩製形——傳統美學思想與藝術批評〉，收入郭繼生主編，《美感與造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 石守謙，〈神幻變化：由福建畫家陳子和看明代道教水墨畫之發展〉，《美術史研究集刊》，期 2，1995。
- 石守謙，〈文徵明與大眾文化〉，收入《台灣 2002 年東亞繪畫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2。
- 何谷理，〈章回小說發展中涉及到的經濟技術因素〉，《漢學研究》，卷 6 期 1，1988 年 6 月。
- 余輝，〈十七、十八世紀的市民肖像畫〉，《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 年第 3 期。
- 吳聿明，〈太倉南轉村明墓及出土古籍〉，《文物》，1987 年第 3 期。
- 吳蕙芳，〈《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及其史料價值〉，《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期 30，2000 年 9 月。

吳蕙芳，〈民間日用類書的淵源與發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 18，2001。

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以江南為討論中心〉，發表於「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年 11 月 21-23 日。

李國安，〈明末肖像畫製作的兩個社會特徵〉，《藝術學》，期 6，1991。

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卷 85 期 1，1996。

汪世清，〈《畫說》究為誰著〉，《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汪慶正，〈董其昌法書刻帖簡述〉，收入 Wai-kam Ho, ed.,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 vol. 2, Kansas City: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1994.

林麗江，〈徽州版畫《環翠堂園景圖》之研究〉，收入《區域與網絡——近千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1。

林鶴宜，〈晚明戲曲刊行概況〉，《漢學研究》，卷 9 期 1，1991 年 6 月。

邱仲麟，〈誕日稱殤——明清社會的慶壽文化〉，《新史學》，卷 11 期 3，2000 年 9 月。

金文京，〈湯賓尹與晚明商業出版〉，收入胡曉真主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

胡道靜，〈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影印本前言〉，《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

唐國球，〈試論《唐詩歸》的編集、版行及其詩學意義〉，《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

- 徐邦達，〈王翬《小中現大》冊再考〉，《清初四王畫派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 馬孟晶，〈文人雅趣與商業書坊——十竹齋書畫譜和箋譜的刊印與胡正言的出版事業〉，《新史學》，卷10期3，1999年9月。
- 馬孟晶，〈意在圖畫——蕭雲從《天問》插圖的風格與意旨〉，《故宮學術季刊》，卷18期4，2001。
- 馬孟晶，〈耳目之玩：從《西廂記》版畫插圖論晚明出版文化對視覺性的關注〉，《美術史研究集刊》，期13，2002。
- 張子寧，〈《小中現大》析疑〉，《清初四王畫派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 張子寧，〈董其昌與《唐宋元畫冊》〉，《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 陳德馨，〈《梅花喜神譜》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 陳德馨，〈《梅花喜神譜》——宋伯仁的自我推薦書〉，《美術史研究集刊》，期5，1998。
- 傅申著，錢欣明譯，〈《畫說》作者研究〉，《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 硯父，〈元刻《草書百韻訣》箋註〉，《書譜》，期21，1978年4月。
- 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利瑪竇來華前後中國人關於異域的知識資源及其變化〉，發表於「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國際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0月22-24日。
- 劉巧楣，〈晚明蘇州繪畫〉。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 劉巧楣，〈晚明蘇州繪畫中的詩畫關係〉，《藝術學》，期6，1991年9月。

- 蕭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中）〉，《文獻》，期 22，1984。
- 蕭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下）〉，《文獻》，期 23，1985。
- 蕭東發，〈明代小說家、刻書家余象斗〉，收入《明清小說論叢》，輯 4。
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
- 大木康，〈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
號 50，1991。
- 大木康，〈山人陳繼儒とその出版活動〉，收入《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冊下。東京：汲古書院，1990。
- 小林宏光，〈中国絵画史における版画の意義——《顧氏画譜》（1603 年刊）
にみる歴代名画複製をめぐって〉，《美術史》，期 128，1990 年 3 月。
- 井上充幸，〈明末の文人李日華の趣味生活——『味水軒日記』を中心に——〉，
《東洋史研究》，卷 59 號 1，2000 年 6 月。
- 伏見沖敬，〈永字八法〉，《書道史點描》。東京：二玄社，1979。
- 坂出祥伸，〈解説——明代日用類書について〉，收入《新鐫全補天下四民
利用便觀五車拔錦》，《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 1，明神宗萬曆二十
五年(1597)序刊本。東京：汲古書院，1999。
- 坂出祥伸，〈明代「日用類書」醫學門について〉，收入氏著，《中國思想
研究：醫藥養生・科學思想篇》。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1999。
- 岸本美緒，〈明清時代の身分感覺〉，收入氏著，《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
東京：汲古書院，1997。
- 島田修二郎，〈《松齋梅譜》解題〉，《松齋梅譜》。広島市：広島市立中
央圖書館，1988。
- 海老根聰郎，〈王繹・倪瓚筆 楊竹西小像圖卷〉，《國華》，號 1255，2001
年 5 月。
- 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收入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
育史研究》。東京：国土社，1958。

- 酒井忠夫，〈序言——日用類書と仁井田陞博士〉，《五車拔錦》，《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1，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1597)序刊本。東京：汲古書院，1999。
- 森田憲司，〈『事林廣記』の諸版本について——国内所藏の諸本を中心に〉，收入《宋代の知識人——思想・制度・地域社会》。東京：汲古書院，1993。
- 森田憲司，〈關於在日本的《事林廣記》諸本〉，《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
- 増田知之，〈明代における法帖の刊行と蘇州文氏一族〉，《東洋史研究》，卷62號1，2003年7月。
- 磯部彰，〈明末における『西遊記』の主体的受容層に関する研究——明代「古典的白話小説」の読者層をめぐる問題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期44，1980。
- 蘆田孝昭，〈明刊本における閩本の位置〉，《天理圖書館報 Biblia》，期95，2000年11月。
- Barnhart, Richard. "The 'Wild and Heterodox School' of Ming Painting," in Susan Bush and Christian Murck, eds. *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 Bol, Peter K.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Wuzhou ca. 1200: Finding a Place for Pan Zimu and the *Complete Source for Composition*," 收入《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96。
- Burkus-Chasson, Ann. "Elegant or Common? Chen Hongshou's Birthday Presentation Pictures and His Professional Status," in *Art Bulletin* 36:2, June 1994.
- Chartier, Roger. "Popular Appropriation: The Readers and Their Books," in his *Forms and Meaning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 Darnton, Robert. "Philosophers Trim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the Encyclopédie," in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 Darnton, Robert.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in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90.
- Fong, Grace S. "Female Hands: Embroidery as 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aily Life, Knowledge, and Chinese Modernities,"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November 21-23, 2002.
- Hayes, James. "Specialist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Hegel, Robert E. "Distinguishing Levels of Audiences for Ming-Ch'ing Vernacular Literature,"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Johnson, David. "Communication, Class, 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Johnson, David. "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Lin, Li-chiang. "The Proliferation of Images: The Ink-Stick Designs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Fang-shih mo-p'u* and the *Ch'eng-shih mo-yuan*,"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8.
- Ma, Y. W. "T'ung-su lei-shu," in William Nienhauser,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Rawski, Evelyn S.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Stuart, Jan. "Introduction," in Jan Stuart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Worshipping the Ancestors: Chinese Commemorative Portraits*.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01.
- Sullivan, Michael. "Some Note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t," 《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藝術史組。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0。
- Tadao, Sakai. "Confucianism and Popular Educational Works," in William de 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 Wang, Cheng-hua. "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s: 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s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 (r. 1426-35),"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8.
- Weerdt, Hilde de. "Aspects of Song Intellectual Life: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Some Southern Song Encyclopedias," in *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 vol. 3, spring 1994.
- Wei, Shang. "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Cihua* and the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發表於「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7月16-17日。

Widmer, Ellen. “The Huangduzhai of Hangzhou and Suzhou: A Study in Seventeenth-Century Publishing,”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1, June 1996.

Zurndorfer, Harriet. “Women in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Chinese Encyclopedia: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from Some Sung, Ming and Ch’ing Works,” in Zurndorfer, ed., *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1999.

Daily Life, Commercialized Knowledge,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Late-Ming Fujian Household Encyclopedias o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ang Cheng-hua^{*}

Abstract

The late-Ming household encyclopedias (*riyong leishu*) produced in Jianyang, Fujian, have long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historians as sources that offer some insight into the daily lives of commoners. This study, however, does not treat these cheap imprints as direct reflection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realities but as a category of cultural products tha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spering print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late-Ming China. Firs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mmercial strategy of the Fujian publishers, examining their target audience. They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household encyclopedias, of which we still have at least thirty-five editions. Since there were several kinds of household encyclopedias circulating in late-Ming book markets,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specific content, style, and printing quality help us discover why and among whom the Fujian encyclopedias were popular. They met the needs of functionally literate people who were not highly educated, but who had enough disposable income to learn about urban culture. These people constituted a group of new cultural consumers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educated literati and rich merchants who had a long history of consuming books and other cultural products.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e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ections on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 several editions of the encyclopedias to examine how the Fujian household encyclopedia helped to create meanings for everyday life and delineate alternative social spaces. First, it is clear that these publications represent late-Ming fashion in art and culture. Artistic work was deeply implicated in daily life; for example, playing visual gam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could be fashionable in social gatherings. Second, the artistic knowledge promoted by Fujian encyclopedias reveals a great deal about how social practices related to art in the late Ming—a view tha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literati writings on art. If reading as a kind of social practice exerts social influence, we can also detect a social space that was formed by the circulation of the Fujian household encyclopedias. And this social space, regardless of its differences from upper class social space, demands that we reconsider the dichotomy between “elite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Keywords: daily life, commercialized knowledge, cultural consumption,
household encyclopedia**